

呈

繳



其
魯
教
與
階
級
鬥
爭

香

鳴

譯



青島博愛書局出版

Y.N.

種十四第書叢年青

爭鬪級階與教督基

獻辭

我將此書紀念卡爾·馬克思，
他是我少年時代的社會大師，
但現在我已成爲他思想上的反對者了。

——貝蒂也夫

序

中國的思想界，從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以後，顯然有一個很重要的轉變，那就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年，對社會制度問題的注意。經過一九一八一事變，和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世界經濟恐慌以後，大家對這問題的注意，更從學理上的討論，轉到實際解決方法的探求。我們試一看近十年來出版的書籍和許多刊物的論著，便曉得它們所取的題材，大半都在社會科學的範圍之內。可是在基督教方面，這些問題却始終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尤其缺乏的，就是以基督教為立場的，關於目前最重要的一些社會問題——例如本書所提出的階級鬥爭問題——的討論。因此，我們便覺得這一本書的介紹，在目前是很有意思，也可以說是急不容緩的。

著者是一個俄國人。在起初的時候，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因為他不是一個唯物論者，所以他始終沒有接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沙皇時代，他因為反對把當時的教會，變成統治者的工具而被放逐。革命以後，他

做過莫斯科大學的哲學教授，但後來他信了基督教，因此便不見容於當局。以後他便住在法國，從事於教書與著述。這幾年來，他的著作很多，風行於歐美各國，尤其引起基督教思想界的注意。本書就是他的近著之一。

著者在本書的理論，可以說是優秀的基督教思想的代表。他是一個觀念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他對於現社會的分析和了解，却是十分唯實，十分透澈。他不但否認階級的存在，他也肯定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他對於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不但不替它辯護，並且斷定它的必然滅亡。對於基督教，他認為它應當毫無疑義地站在被壓迫者方面，為他們奮鬥。他認為暴力是與基督教的精神不相容的，但他甚至承認：暴力可以用作解放的工具，並且，因為現制度在過去所造成的罪惡，由於冤冤相報的定律，暴力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把企圖維持現制度的許多錯誤的理論，和文飾的狡辯，——不管它們是站在基督教或資本主義的立場的——無情地暴露出來，並指出它們的虛偽之所在。著者在本書末一章所說的幾段話，是值得每一個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讀者的注意的：

「當我們說超出於階級仇恨之上的時候，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教會應當贊成階級的調和，使被壓迫與被剝削的人們完全屈服。這是一種最徹底的偽善，使教會永遠戴上資產階級的標記。戰爭並不簡單是一個罪惡，有時它也許是一種善行，爲了人之適當的尊嚴，有時也需要戰爭。當剝削者顯然需要宣傳屈服的時候，我們假使又來對被剝削者宣傳這種東西，那是完全錯誤的。況且謙卑並不是一個社會的行爲，而是私人的與精神的行爲。教會的責任，首先應該站在道德的與精神的立場上，而不應用某種社會制度的名義，去譴責人對人的剝削與壓迫。它必須祝福那些尋求更公正與更合人道的制度的人們，且囑咐他們用自己的膽量，活動與自由，去爭取較好的前途。」（頁一一二）

「國家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的黨徒們，很狡猾地罵工人自私，說他們把自己的階級利益，置於民族的與國家的利益之上。可是在內心和道德方面來說，情形並不如此。工人們之懷疑財政的與國際的（被稱爲國民的）政策是應該的，他們假借了國家的名義，號召工人去犧牲性命，而暗中

則銀行家大發其財；這樣的事情，不可否認是常常有的。（頁一二八）
還有以下的一段話，特別值得我們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基督徒的注意；

「國家主義祇有在東方民族中，還有前進的作用。東方民族的國家主義也似西歐的資本主義一樣，仍有其社會的真實意義。一般地說來，國家主義之繁殖仇恨與敵意，正與階級鬥爭相同，它除開了這種憤怒的鬥爭，那就無法前進了。至於種族主義，則不論它的原因如何，總顯然是——個反基督教的現象；雖然它有時也採取宗教的形式，但這只能說是異教主義一時的暴發；法西斯蒂與希特勒的黨人們都是異教徒，是基督的敵人。」（頁一二七）

以上所引的一些話，我相信是可以使任何思想前進的人發生共鳴的。但我們却要在這裏鄭重地指出本書對於階級鬥爭那一個問題所有的特殊的意見。這些意見，是從基督教的觀點得來的，也是與流行的，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社會思想絕不相同的。不管一般人對於這些意見，取什麼態度，它們無疑地是代表一種有着長久的歷史和廣泛的信從的思潮，而不可忽視。並且在

這舊時代的末落和新時代的開始的時期中，它們將要成爲對社會運動者一個嚴重的挑戰。

首先，我們要說：關於本書一些瑣碎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的爭辯，我們不想多說什麼話。這些爭辯，有的是無關宏旨的，有的是吹毛求疵的，甚至有的——我們相信——是誤解馬克思主義的。總之，它們對於現在我們所看見的活的，行動的，鬥爭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所要特別指出來的是本書所多次強調着，從基督教信仰出發的幾點基本的理論。

本書最主要的一個觀點是人的價值。這裏的所謂人不是集體的「人」，而是個別的「人」。著者認爲對人的價值的觀念之不同，就是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問題的態度的分別。馬克思主義雖然是物觀的，却並不否認人的價值，但它所注重的是集體的人，而不是個別的人。個別的人只是集體機器中的一個輪齒，他的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爲他是社會中的一員，階級中的份子，在他離開集體，或是與集體爲敵的時候，他便要失去他的價值。著者却不同意於這個意見。他以爲人，首先是一個人，其次乃是社會和階級中的

份子；社會與階級是偶然的，是可以更易的，而人的本身却有他永久超然的價值。這些永久的價值包括他的精神，思想，和良心上的自由，自我的發展和創作的機會等等。換句話說，他應當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他的真，美，與善的生活。著者以為在馬克思的系統裏面可以說是沒有「人」的地位，因此，人的真正的價值在它裏面也無從發展。他並不否認現制度並沒有給人以真正的自由，但他以為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改變現制度，那無異是以暴易暴。在他看，共產主義把個別的人溶化於非人的集體中，正和資本主義一樣，又因為二者都是過於看重物質，所以在表面上它們無論怎樣不同；他們都是「布爾喬亞」性的。著者是憧憬着歐洲民主革命以前的貴族。他認為貴族制度固然有許多不適合於時代的東西，但他們所養成的那種寬大的精神和儒雅的生活都是值得今日的借鏡，所以他是主張養成一個新的精神上的貴族，去負起未來的創造事業。

著者的結論大致是這樣的：他承認階級的存在，他也不反對階級鬥爭，但他以為階級的問題，不能單靠物質經濟這些東西來解決，也要靠精神，宗

教，道德，教育，技術這些東西的幫助，因為我們對未來的希望，不只是舊社會的變革，也是新靈魂的產生。既是這樣，階級的仇恨，固然要把它消滅，就是任何可以毀滅精神價值的手段，也不當應用，因為，像耶穌所說的：『壞的樹不能結好的果子』。總一句話說，因為著者是一個唯心論者，所以他看精神比物質更爲重要。他以為精神是主動的，物質是被動的，因此，他絕對的反對資本主義，也相對的反對馬克思主義，因為它們都是把物質看得比精神更爲重要的。

我這篇序文的任務，只是指出著者思想的路徑，而不是判斷它的是非，但爲讀者更清楚的把握起見，也許我還應當在末尾加上幾句話，以作本文的結束。著者的注重精神，注重個人的價值，我以為是對的；著者指出馬克思主義有把個人消失於集團，和採用妨害目的的手段之危險，我以為也有事實的根據。然而我們却不得不承認：社會制度不改變，則個人的價值，即無從發揮；物質基礎不健全，則精神生活，將無所依附。因此，與其顧全個人而妨礙社會，與其注重精神而忽略物質，終於使個人不得不衰萎於社會惡勢力之

下，使精神不得不因失去物質的支持與營養而消失而毀滅，曷若先求社會生活的解放，先求物質基礎的奠定，而努力於減少變革過程中的流弊。這一個結論，從我們上面所引證的那些話看來，我相信著者是同意的，並且他更指出來：社會鬥爭那件事實，不管我們做了什麼別的事情，是必會來到的；因此，我們的問題，就不是會不會有社會鬥爭，而是怎樣去減少社會鬥爭的流弊。同時，我們覺得著者之屢次強調着他的那幾種主張，却不是一件多餘的事，因為在這轉變中的時代，我們是應當永遠把這些東西放在面前的。事實上，現在唯一試驗着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在社會主義初步建設成功之後，已經起首注意到本書著者所主張的那些價值。在這一點上，近人的幾本著述像建設中的蘇俄（本會出版）反利潤制度（本會出版）莫斯科印象記（胡愈之著）從東北到蘇聯（戈公振著）萍蹤寄語（第三集 韜奮著）都可供參考，希望讀者拿來研究，庶幾對本書所提出的關於事實方面的問題，可以作一個更清楚的解答。

吳耀宗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五日

基督教與階級鬥爭簡目

吳 序

- 第一章 階級鬥爭是一個事實……………(1)
- 第二章 馬克思理論的批判……………(20)
- 第三章 基督徒對於階級鬥爭的估計……………(45)
- 第四章 真正的與形式的自由……………(50)
- 第五章 貴族資產者與工人……………(80)
- 第六章 教會與新社會的實際……………(109)

第 一 章

階級鬥爭是一個事實——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

我們這罪惡的世界，是兩種相反力量的鬥爭場。這鬥爭是決定有機世界之存在的，它是人類社會中的主要事實；并且這種鬥爭似亦在精神界中進行着，那就是善與惡的衝突。整個的宇宙生活，均被兩極化及相反相拒的原則所支配，故其中有不斷的鬥爭。辯證法即為論理界中的一種鬥爭。這一種普遍的鬥爭，曾先後被黑拉克立士斯，盤姆，黑格兒，巴霍芬，馬克斯·尼采，杜斯妥也夫斯基諸人所發見，只是各人的觀點不同罷了。至於社會界中的階級鬥爭，則僅為宇宙鬥爭與相互矛盾的各種表現之一。其他如在兩性間與國家間的衝突中，也能看到這一宇宙鬥爭的表現。

基督教徒的意識，對於這一事實究應採取何種態度？我們假使不否認它的存在，那末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見解。基督教徒的責任不應該規避真實，而應求其充分的認識。倘將真實加以「理想化」，則最非基督教徒之所應為。



當可怕與惡毒的真實，必須加以暴露與斥責之時，則基督徒應較任何人更無忌憚。階級鬥爭乃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它在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它那無可控制的暴力，比在任何時代，更清楚地顯示出它的特徵來。

資產階級的思想，不以隱藏此種鬥爭為已足，它甚至要根本否認有任何階級的存在。在中等階級的民主主義社會中，法律上是人人平等的。那裏沒有階級的特權，窮人可以成爲百萬富翁，而百萬富翁也能變爲窮人，因爲就法理及政治上說來，這兩種人之間是沒有分別的。因此，假使有人以爲取消了等級及賦與了公民的與政治的平等權利之後，就不會再有壓迫，鬥爭與社會的不平等了，那我們就能稱他爲資產階級的人。依據這種思想說來，世界上祇有一種個性上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勝利不僅屬於最強與最幸運者，而且同樣地也屬於那最好與最有用者；所以實際上，這勝利祇是某些德性的報酬。資產者的心理是樂觀的，他們相信在各種衝突的利益之間，自有其自然的和諧。至於社會主義者呢，就這一個名詞的廣義說來，彷彿是悲觀主義

的。因為他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的實際情形是很壞的，在這一方面，他們的心理是近於基督徒的而不近於資產階級的。

即使貴族階級，比之於資產階級也具有更多的德性，因為它公開而忠實地承認不平等，且自視為較高的與特權的等級，而資產階級則故意將自己的特殊地位文飾起來。此外，貴族們的特權並不是建立在財神的國土上的。在古代的貴族社會中，階級還不明顯，但等級卻是公然被承認着的。因此，他們的特權很容易被人所發見和懲罰；但在民主主義的社會中，可不能那樣做。封建爵爺們的戰爭縱然殘酷，但它並不戴着假面具，而且是差可容忍的；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則決不如此，它在銀行，證券交易所，國會政黨以及各報紙之間進行着秘密的，隱藏的與不可捉摸的戰爭，叫人更難容忍。在這個社會裏，任何事物都傾向於帶有這樣的一種性質，就是要帶上一種複雜的象徵主義，秘密的經濟賭博，以及那屬於金錢魔國的權力。這種性質就銀行說來，彷彿特別真實，因為它是不可目見的世界統治者。

人類社會的歷史，乃是各種不同的社會派別間，各種種族，民族，世

代，家族，宗教，宗派間，各種思想與行動的派別間，行會與職工會間，以及社會上各個階級間的長期鬥爭的一種暴露。而各階級間的鬥爭，無疑地是各種鬥爭中之最殘酷者。很久以前，這無窮的鬥爭，就已被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所認識了，他給它寫下了一張證明書。這階級鬥爭又爲工團主義者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所肯定，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卻只有馬克思一人，因爲對於這個殊死的鬥爭，有着明確的了解，從來這鬥爭不過是歷史上一些惡魔似的與不合理的力量，但一經馬克思之手，卻把它很出色地同極端的理智主義聯結起來了。不過他將各種社會派別間的複雜的鬥爭，歸結成一個簡單的階級鬥爭，其實這祇是十九世紀中的情形纔是如此。他將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的諸範疇變成爲絕對的，然後，他又把它們擴大到全世界整個的歷史過程上去。但是此種矛盾祇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首先成爲階級鬥爭，因爲就近代意義上說來的階級，過去並不存在。所謂等級也者，乃是指生物的與社會的兩方面說的，生物學上的遺傳，自然種類（即種族）的形成，占據着主要的部分。種族的意識形態，時常是自然主義的。（註）所謂貴族階級，並不

是我們所了解的社會的意義，而是指幾世紀來進化着的遺傳的血統；最重要的，它不是由經濟的生產來決定，而是由祖先及其生物的與社會的繼承來決定的。階級鬥爭的發生，即表示貴族階級的沒落，因為它雖能在種族、民族及國家之間的衝突中存在——實際上，它也正是在這些衝突中形成的——但是在純粹的社會鬥爭中，它卻不能不屈服了。貴族階級在馬克思主義的計劃中是沒有地位的。

我們祇要把一切先入之見放開，來注意日常的生活，就可以看到在我們這個時代，階級間，以及各社會派別間的鬥爭，怎樣支配着政治的與社會的生活。各個政黨差不多完全被階級利益與階級心理所決定。而且這些政黨，很容易依照着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來加以區分。當總選舉與政治危機之時，只要你注意在那法國人稱之爲 Belfort (註三) 的地方，在商店與公共汽車中，或在街頭巷尾傾聽，那你總可以聽到這樣的話：「模蔭凱雷對於大企業是好的，但是對於做小買賣的人，卻是赫里歐好些。」在政黨政策的後面，你常常能找到大財閥，工業家，商人，小資本家，普通商賈，農民以及產業工人的利

益；你簡直很難找到一個不被社會階級所左右的政黨。并且人們的智慧及其日常生活總帶有他所屬階級的色彩；在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在中等階級的上中下三等之間，在職業階級與「知識分子」之間，有着極端不同的性格與生活條件。至於爲官吏階級及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智慧狀態，則難於用馬克思的學說來加以說明，因爲這些社會派別是不能以生產來決定的。

此外還有一些特別的派別，那是例外環境的產物，他們也有一種共同的心智，公共的意見，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這就像俄國的海外「僑民」，其中一大部分是從過去的特權階級中產生出來的。它的社會成分很複雜，因爲它包含着貴族的，各種中上級官僚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以及抱着各種不同見解與從事各種職業的知識分子的代表；至於農民與產業工人則爲數甚微。這一團體有它自己特殊的傾向，對於革命與蘇俄政權，亦有其階級的評判。在這些僑民中，卽令是具有民主的與激進的傾向者，對於蘇維埃政制都很難持有極端不同的見解。無論是過去特權階級中的成員，他們在共產主義的政制之下受到了虐待與毀滅，或者是那些新俄羅斯的代表者，卽從勞働

羣衆中被號召去建設新國家，因而蒙受共產主義之利益的人們，對於蘇維埃的見解總相彷彿。有一部分僑民，特別是那些較為年青的人們，實際上已經轉入到工人階級。他們在社會的意義說來，已經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了；但是此等工人的最大多數，仍舊保持着貴族的心理與神態，且自視爲優越社會等級中的成員，不過現在處於患難中罷了。有一些在工廠中工作的年青僑民，也已經學習到咒詛資本制度了，但他們仍然是傳統的保皇黨人，國家主義者，而且是特權階級的兒女們。由這一例子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此等社會羣別之形成與心理，是如何的複雜了。

馬克思的計劃，雖然把事情弄成這樣簡單的一種形式，但他確曾發明了一個深刻的真理。革命也正與經常的政治生活一樣，有其階級的性質。歷史上一所有的革命，不管它採取何種象徵，不管它集合在何種思想的旗幟之下，總是被壓迫的與被奴役的階級起來反對特權的與統治的階級；這往往是人民集體的下意識之一種爆發，他們積聚着的苦痛，以及忍受着的恥辱，都要求報償。在每一次革命中，階級的報復，總起着主要的作用；常時還有一種社

會的升沉，位高者傾頹，低微者上升。講到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個象徵，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這一種學說，都不過是在各社會階級的鬥爭中揭起來的一面旗幟罷了。

馬克思主義者以為世界上能有『階級真理』的存在，因為他們沒有將自己的理論推斷到底，其實在思想上根本不能得出這樣肯定的論斷。他們假定真理乃是實際經濟及任何階級之社會地位的反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矛盾及其知識論上的荒謬。這樣的一個假定，竟使知識成爲不可能了。這就等於否認了經濟唯物主義的學說，因而摧毀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礎。

唯物史觀的基礎到底是什麼？它祇是資本制度下工人階級狀況的一種暫時反映，以及鬥爭中真實有用的武器呢？還是關於社會及歷史過程之本質的一個真理（既係真理，必須是絕對的）呢？

馬克思從不允許說他的學說是相對的，他也不願將它與其他的學說列於同等的地位，他不承認它是某一經濟實體的反映，而且祇表示了一個階級的利益與心理，他覺得自己是啓示了歷史過程之祕密的人。但是在原則上，世

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這樣東西的存在，而在實際上呢，至少只有一個真理。即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不過是經濟與階級鬥爭的反映罷了！不過這個學說卻將那認識的對象提高到超出於一切相對性之上。這彷彿那被馬克思所闡明真理的無產階級，在認識的能力上，較其他的任何階級均為優越；它的意識不再是經濟在思想上的幻想似的反映，而是認識真實的鎖鑰了。這一問題，當我年青的時候，時蒙腦際；那時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正在寫我第一本著作：社會哲學中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那時我甚至還企圖建立一種無產階級的知識論。但因我從來不會是唯物主義者，所以也不能成爲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哲學上我是唯心主義者，當我研究了叔本華之後，就寢饋於康德與費希德的學說。我看真，善，美都是絕對的東西，因爲我發見它們都植根於超絕的意識之中，祇有那爲我們所覺察到的其中的差度，才是相對的。所以整個問題就在於去認識那心理意識的條件，究竟怎樣的條件才有利於超絕真理的啓露。我相信無產階級有一種心靈上的結構，是利於這種啓露的，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心理意識是與超絕的意識相適合。

的，因為它是一個勞苦而統一的階級，它被人剝削，但自己並不知道剝削的罪惡。我祇發覺到無產階級的社會的與心理的條件是利於去感悟那絕對真理的，同時就論理上說——雖然不是從心理上說——它在倫理的意義上，又利於去為善而鬥爭，關於這個思想，我並不用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名詞來表示，但它卻與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熱情相符，且與其無產階級偉大使命的思想不謀而合。後來我遠離了幼年的思想；但對於人類知識與超人知識間的關係，認識真理的絕對性這兩個問題，仍舊以為是根本的；因為這個問題，就是要研究人類中怎樣的條件，纔利於去認識真理。

真理不能屬於某一個單純的階級，但它能為某一階級所誤用，這在歷史上是常有的事。馬克思斷定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有一種階級的虛偽，它在傳播着謊語與幻想，那的確是對的。他那全部的社會學就是社會的病理學，至於他的社會生理學卻是錯誤的；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所惑，而不能見到另外一些健全的進化。據他的意思，社會的健康，即未來社會主義的集體性，一定是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騷動的結果，欲求事物之改善，必先使

其變壞。

不過那種流行的見解，以為階級鬥爭是馬克思與社會主義者發明的，而且祇被革命的工人所進行着，那也不是不忠實而錯誤的；實際上，中等階級與統治階級也同樣地在進行階級鬥爭。不過當某一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其目的在維持既存的與特權的狀態，則為勢較緩，而企圖改變社會現制度的鬥爭，則較為兇猛而已。換句話說，對於現狀的維持，總彷彿不是戰爭的殘酷行為，而對於改變現狀的企圖，則似乎是暴行了。這是我們現代的虛幻現象之一。

工人與社會主義者公然進行他們的階級鬥爭，公開宣佈他們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改善他們的地位，為增加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他們明白宣佈自己是較優於資產階級的；至於資產階級呢，他們同樣地在進行階級鬥爭，但是掩護在崇高的感情之下，他們假借着愛國主義，國家的安全，自由，文明的原則，最不幸的，他們竟假借着宗教。在政治的與社會的生活中，唯心主義的幻影，自我的提示，以及其他的幻想，常常蒙蔽着我們，使我們不能看

到真實；意識中經驗過的東西，與我們在下意識中所感覺到的，十分不同。講到馬克思的方法，卻能與佛洛伊特（Freud）的相近；他排斥了意識的欺騙，去揭發那潛伏在階級下意識之底層的衝動與傾向；不過他那唯理主義的心理學，使他不能深入到自己所發明的事物中去。結果，他的（尤其是他那繼承者的）著作，祇落得一首粗暴的諷刺詩，它罵資產階級是懷着故意犯罪的意旨的。

其實呢，在歷史上起作用的，與其說是人類的貪婪，毋寧說是一些不合理的力量，崇高的概念，以及與之俱來的漂亮言辭。在社會的生活中，大半起着一種奸詐的與惡毒的作用，但由此卻不能說抱有這些思想的人們，是故意來欺世惑人的，也不能說他們的行為，一定被物質利益的動機所驅使。當虛偽一經被合法化之後，一切想利用這虛偽的人，就去求助於法律，因此，法律常常是罪惡的保障者。馬克思主義雖然產生了新的幻想，但它無論如何一定還要人們給它以這樣的信譽，即它是堅持着社會實際主義的，它不規避事實，它把歷史首先看作是相反事物的衝突，而且它不相信那背後沒有推動力

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將感情的社會唯心主義倒置過來；它發見一切生命都是爲力量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存在的學說是錯誤的，因爲它祇在物質的過程中發見了存在，並沒有感悟到它那基本的原理，它不知道一切能力的原始泉源。不過有一點我們也得承認，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學說大部分是正確的，尤其是它對於現制度的許多譴責都是合乎正義的。本來，思想，原理，名辭，其本身都無用處，所以用它們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也就沒有用處；唯一適當的武器祇有「存在」，即比馬克思主義本身所憑藉的更爲深刻與堅強的存在。

歸根結蒂地說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謊語，因爲世界上有一個全知全能的權力，這是一切能力的泉源——上帝。我們不能否認；社會生活是被權力所統治着的，但是無論經濟或階級鬥爭，都不是最高的權力；這個權力，祇能在精神中去尋找——就是罪惡的力量，也都是精神的。物質是微弱的，情性的，被動的；而精神卻是自動的，就是那不承認精神的唯物主義者，也是爲它所驅使着。所以將真實建立在唯物哲學的基礎之上，簡直是再荒唐沒有

的了。存在不為意識所決定，意識方為存在所決定；不過這存在是精神，而不是物質，因為物質祇不過是意識的一種結構。

學院式的唯心主義與法理的自由主義是沒有力量的，這話完全正確。法律要表現出自己的力量，祇有依靠着暴力，但是這暴力可不是經濟的力量，因為它的根基並不很深；而且經濟之心理的結構是很複雜的，它的過程不能與物質的過程相符。經濟是人類精神的創造品，它的質量須由精神來決定，它的基礎是精神的；(註三)經濟發展的條件不全是物質的與物理的，其中有一不可缺的部分乃是心靈的。階級的行動，不一定為自覺的經濟利益所指導；祇有那唯理主義的與幸福主義的心理學，纔會作如是想；階級心理上的情感，頗能產生出不利於該階級的行動。誠然，馬克思主義着重階級利益與個人利益間的分別；當一個階級在思想，在表示其意志，在依照其自己的利益而行動時，個人的人格就要毀滅，因為這乃是操在階級手中的一個工具。

例如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那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他們稱之為帝國主義戰爭的解釋，就是如此。不過那由於不合理的魔力所引起的戰爭的瘋狂，決不能

用階級鬥爭的，或經濟觀點的，或物質利益的唯物學說來加以解釋。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給資本主義以一個可怕的，甚至是致命的打擊，開闢了到共產主義之路，因此，這大戰應該是可感謝的。在這裏，馬克思主義之唯理主義的計劃，不能與不合理的實際相符了。上次大戰，是因資本主義制度的瘋狂與不合理而產生的，這一點當然無可置疑；但由此我們卻不能說那戰爭是利於資本階級的經濟的，實際上恰巧相反。共產主義者咒詛屠殺，而這屠殺卻正產生了，而且還規定了他們那心靈上的結構；他們對於資產階級所醞釀的新戰爭，假裝憤怒，其實他們無時不在希望這一戰爭，因為他們知道一有戰爭，自己的勝利就有把握。

這一切都表示出馬克思主義之心理上的錯綜，馬克思主義者普通都不是高明的心理學家；他們不懂得各階級的心意，他們對於各階級的解釋，都不過是唯理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初步應用。總之，關於社會各階級的真正的心理學，還有待於人們的創造。(註四)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學說，與「人民」這一個老觀念絕了緣，且予

「平民主義」與傳統的民主主義以重大的打擊。自主的人民分成爲各個階級，它們的利益相互反對，彼此間進行着兇猛的鬥爭。馬克思以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神話來對抗盧梭之自主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神話。他認爲無產階級是一個救世的階級，它能呼喊出一般的意志，能使人類得到自由與救援。雖然這學說顯然是神話性的與不自覺地恢復了以色列人爲上帝之選民的舊思想，但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較之盧梭論人民的普遍意志，及其無誤性與主權的學說，總更近於真實。馬克思把那無誤性從人民移轉到無產階級，可是這兩者中都不存在。

在每一民族或國家中，祇叫它採取了民主主義的形式，就一定會有階級鬥爭，而那所謂人民的「普遍意志」祇是一個傳習的虛構。當然，超出階級之上的還有民族的與國家的利益，對於這些利益，祇要社會還得生存，就必須加以保護，而階級性的政權，至少也必須去保障一點此種利益。不過形式上被人們所了解着的民主主義，隱藏了各政黨間的真實鬥爭，它時常成爲某一階級施展其統治權力的工具，即成爲一個政治的假面具。這在法國尤其可

以看得明顯，那裏的政黨甚至取幾個虛空的名詞；爲要在選舉中多得一些票數，那些沒有絲毫社會主義氣味的政黨，也會自稱爲社會的。國會本來是要代表民意的；但實際卻成爲各政黨的戰場，它們的煙霧與叫囂，掩蓋了階級間的鬥爭。這樣，「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就得不到一個機會去表示，事實上他們的利益祇能靠職工會來保障。因爲歷史上的民主主義是形式的而不是真實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在這一方面的批評，我覺得頗有根基的。民主主義賦人以政治的權利，但並不給他以利用此種權利的工具，因爲要使人能享受這種權利，那問題是屬於社會的與經濟的方面，而不屬於政治的方面。

在政治的民主主義之下，人們很容易陷於失業，窮困與赤貧；個人的經濟權利是沒有保障的，而選舉權之享受則無補於事。政治的與法理的平等，與社會的及經濟的至不平等同時存在；社會的等級可以取消，一切公民可以宣佈平等，但是社會之分解爲各個階級，卻達到了最高點。因法國大革命而流行起來的關於平等的神話，其真正的罪狀就在於此；在法國，你可以找

到顯著的例子，由此，你能極清晰地考察到這個現象。在那以普選與國會制度為基礎的民主國家中，國民是由國家來組織成功的，但社會則無人加以組織，它的組織與國家平行着前進，發生了很大的困難，這些困難又使社會分解。所以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社會的組織力要強大得多，那是無可爭辯的。

我們不能自止地要反對那以人民主權的神話為基礎的民主國家；所以我再說一遍：祇有職工會纔算是真正的社會組織。真正的民主主義，一定要是社會的，產業的與經濟的，使一切工作與人民的利益及其應有的要求，得以實現。馬克思主義對於民主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自己卻又創造了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神話，它同樣地將虛構代替了真實。這是關於全真之一種新的與狂妄的形式，那是不能允許的，因為真正的全真乃是一種心靈的閃光，以及人與自然的變形。

(註一) 古平爾 (Gobiner) 關於種族的學說完全是自然主義的 (見其所著論人種的不平等)。

他用自然主義的理由而不用社會的證據來證明貴族階級的正當；見布格雷 (Burgley) 的科學之前的民主主義。

(註三) 曾即公共場所——譯者

(註四) 對於這一點，麥克羅華伯 (Max Weber)、桑巴特 (Sombart)、賴脫特爾夫 (Trotsky) 的著作已經指示得很充分了。

(註五) 德曼 (Jo Mann) 曾全面這樣做：見他的超出馬克思主義之上。

第二章

馬克思理論的批評——社會與階級——由價值的觀點來觀察階級

在上面我們已經見到了，馬克思將資本制度的諸範疇弄成爲絕對的，而且還將它們擴大到自己這一時代以外的經濟中去；他在全部的歷史中，能看到一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雖然事實上這些階級並不始終存在。

「資產階級」這一個名詞，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應用得極其模糊，它具有極不同的意義。一方面，它用以指示那在資本主義下興起的這個階級，它是因經濟生產的特殊方式來決定的。在另一方面，它又表示整個的統治階級，凡階級中的成員常是剝削者，且富有物質財貨的均可稱爲「資產階級」。布爾維維克樂於應用這一個名詞的第二種意義，因此，一切階級，除了無產階級，連那知罷勞動者都歸入於資產階級。這樣一來，那個名詞就失去了真正的意義，祇成爲一個象徵了。

不過就另一意義說來，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一詞的觀念，也是模糊不清的。它代表了剝削者，「吸血者」的階級，這階級因反對社會的最終發展，故注定了要死亡的；但他又把這一名詞用以指示另一種階級，這階級負有發展物質生產力的積極的偉大使命，且替社會主義安排下未來勝利的條件。假使沒有這個階級，那末救世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自身，也決計不會存在的。資本主義的工業是一件好東西，因為有了它的工廠制度之後，工人們纔能組織起來。馬克思在其社會學說的一方面，是一個進化主義者，他願計到自己所主張的發展中的幾個階段，但是這一進化主義的成分，在俄國的共產主義中卻完全消失了，他們竭力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與資本主義的存在不發生關係；在他們看來，這兩個階級簡直不是實際而是象徵。事實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祇占俄國人的極小部分，而資產階級也始終只是小小的一羣，現在實際上已經不再存在了。俄國的共產主義者以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而是「建設主義」的結果，是強大的蘇維埃政權有意識地指揮着的努力；「必然」的規則，已經代以「自由」的規則

了，這是一個劇烈的轉變。這樣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所遭遇到的變形。

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是與資本主義分開的，它是資本主義真實情形的反映或表徵——至少那些想成爲科學社會學者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會這樣肯定的。馬克思慣於在反對的提綱中思索，這一種矛盾，在他看來是具有普遍的與絕對的性質的；例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根本矛盾，包括了整個的生活；它包括了文化，宗教，哲學，道德之各種派別間的對立，無論在社會的或經濟的方面，莫不受這根本矛盾的支配，無產階級與無神論是聯在一起的，資產階級與宗教又是二而一的東西；前者暗示着唯物主義與集體的道德，後者則代表着唯心主義，精神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德性；諸如此類的，有許許多多。

反對提綱的普遍化，發源於馬克思一元論的經濟的玄學。實際上，「共產主義的俄羅斯」與「資本主義的歐羅巴」之間的對立，從社會的與經濟的立場看來，祇具有相對的與部分的意義，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普遍的。正猶歐洲之不是完全資本主義的（因爲它包括着許多不能算作資本主義的成分）。

蘇維埃的俄國也有許多方面，決不是完全共產主義的。例如在現代的西歐，有一些哲學的與神學的流派，只有那些傻子才會把它們看成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湯姆主義（Thomism，為 Thomas Aquinas 所創的一種教義——譯者）在相當的限度內，是仇視資本主義的；還有麥克思顯雷（Max Scheler）的哲學，加爾巴斯（Karl Barth）的學派是贊成社會主義的，而狄立希（Tillich）的宗教社會主義，甚至還同情着共產主義呢。所有這些流派都是嚴格地反對唯物論的，可是這些宗教運動之仇視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精神，卻是無出其右的了。海特權（Heidegger）的哲學，並不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選擇道路，它和它們是那樣地沒有關係，所以祇有那熱中於經濟唯物論的人們，才會鄭重其事地稱它為資本主義的哲學。直至如今，經濟唯物論想解釋哲學的與精神的思想與流派，所得只是一些怪可憐的結果。馬克思本人，因為對於心靈方面具有敏銳與透徹的觀察，故於詳細的解釋，頗能聰明地自限，這樣倒避免了許多難於成立的老生常談。

馬克思主義的論理結構，顯然是矛盾的，至於階級鬥爭這一部分，在哲

學上是幼稚的。馬克思在其概念方面，堅持着極端學院式的唯實主義；他將思想的抽象作為存在的真實。他觀察了整個的社會及其文化，然後一概稱之為資本主義的與資產階級的，這簡直是對於概念的抽象，且將實體的概念變成為非實體的概念了。他將無產階級化成為一個普遍的階級，這概念也是如此。列寧承認世界上並不能有無產階級文化這一種東西，無產階級祇能享受與吸收一種既存的文化。我們馬上可以看到，馬克思所陷入的根本的論理錯誤，我覺得，就在於他那極端唯實論與極端唯名論的混淆。

要決定一個階級或社會派別的觀念，像馬克思那樣單從經濟的觀點，單從生產來看，是不可能的，社會的分化，也受別種事物的影響，且為其他的原理所決定。歷史上充滿了各社會派別間的鬥爭，它的成因極其複雜，且為各方面的生活所改變；如宗教的，民族的以及知識派別等的生活，都能對鬥爭發生影響。在原始的社會中，那裏還沒有馬克思主義中所指的那種經濟的階級，但是此等社會派別卻早已對立着了。圖騰主義的信仰，決定了一個部落的社會制度，更形成了它的統一；圖騰宗族的聯繫，較之血族的聯繫更

爲密切。(註一)辛麥爾關於社會分化，社會派別之形成與混和的學說，比馬克思的學說深刻，複雜與正確得多。(註二)印度的等級，與馬克思主義的系統不相符合，故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那是不可解的，因爲此種等級是由宗教的思想來決定的。其他如「知識分子」，這不僅是一個社會派別，而又是整個的社會階級，馬克思主義對它也是不會顧計到的；當然，這班人能臣服於資本主義，獻媚中等階級，創造出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但是他們之附屬於資產階級，同樣也能倒入於無產階級。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所發生的這一類事情，我記得一個標準的例子。俄國的作家協會，爲使其會員的利益能得適當的監護，它必須與其他的職工會同樣登記；但是不能辦到，因爲文學的創作，在蘇維埃共產主義的事業計劃中，並無地位，它那計劃所注目的東西，祇有這些多少與經濟生產直接有關的工作。這樣，因爲著作家不是物質財貨的生產者，他們祇能以印刷工人的資格去登記；知識分子並不屬於社會階級的範疇之內，他們祇能被人們視爲不從屬於資產階級即屬於無產階級，不屬於資本主義即屬於共產主義的一個集

團。奇怪得很；他們的經濟地位是世界上最不可靠與最無保障的；他們是被放逐的人，是任何工人中之最無組織者，一當危機到來之時，他們的創造活動就像無用的奢侈品似的被人們捐棄了。馬克思不承認他們是有組織的社會集團，因為不僅在生產工作方面，就是在那純精神與純智慧的創造活動中，他們也不是組織成社會集團的。

他賦與「階級」以絕對的意義，其實「階級」在歷史上雖然起過很大的作用；但它的意義卻是相對的，它是一個人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不可缺的部分。馬克思主義之最可怕的與最非人道的錯誤，就在於它拒絕將人置於階級之上而將階級置於人之上，它貶抑人的最高表現及其最深遠的精神經驗，使其降為階級的附屬作用，不論人的思索或其創造的活動，都須受階級的限制。馬克思丟棄了「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註三)「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永久價值；將此種價值弄成爲簡單的歷史範疇；同時給共產主義社會準備下一個全新的人影。但他那階級鬥爭的學說，以及經濟唯物論的本身，卻又把這個「經濟人」變成爲絕對的了，祇因爲他把這兩種學說，作爲對人類

與社會的一個普遍的解釋。古典經濟學中所應用的意識的方法論上的抽象，被他變成爲一般的關於人與人性的具體教義了。亞丹，斯密承認除了那祇被自利所驅使的經濟人之外，同時還有爲道德的同情心所驅使的人之存在，在這一方面，他會有專著論及。關於人，你依據着這個或那個原理，可以規定出許多抽象的教義來，（而且每一教義都是合法的）因此，你可以把他當作優越的宗教人，當作政治的動物，當作製造人，當作有理智的生物，或當作必須醫治的病人。（註巴在本書的後面，我還要回過來講到「人與階級」的問題。

由論理學的觀點來看，階級鬥爭的全部學說是矛盾而有毒的，因爲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馬克思的論理學是最幼稚與最糊塗沒有的，它對於階級肯定了極端論理的唯實主義，但同時對於社會卻堅執着同樣極端的唯名主義。依馬克思的意見說來，祇當社會主義實現的時候，社會纔是真實的。社會主義實現以前的整部歷史，社會祇能從「原子」的觀點來加以體會，它是那被相反利益所驅使着的各階級的戰場；它是物質原子的一個集體，這些原子在

本階級以內則相互吸引，在本階級以外則相互排斥。這一粗略的唯物論，復因從黑格兒那裏借來了辯證法而得以減輕與複雜，但欲借到這一筆債款，就非大大地犧牲一點論理學不可。假使社會不是一個真實的整體，使辯證的過程能在其中完成，那末社會中就不能有辯證的發展；不過這一層道理，假使從唯物論的觀點看，那是無由發見的，因為唯物論是原子論的與唯名論的。

階級鬥爭既在社會的內部進行，那末社會的本身，在那構成分子的階級未曾產生之前，它一定已經有某種原始的統一與真實了，祇有承認了這一點之後，我們才能從階級鬥爭中希望得到積極的與有價值的結果。實際上，假使沒有社會這樣東西，祇有階級才是真實的，那末它們鬥爭的結果，祇能是確定的瓦解。馬克思所竭力堅持的關於階級鬥爭的辯證法，首先假定了常識與正確的理智已經在一般社會及人類中占得了勝利。但是一個整體，決不能是相異成分集合的結果，至於判斷與理智，則不能是這樣的產物；判斷與理智，一定要超出於這些成分之上，即是說：社會必須較階級具有更多的真實性，雖然階級這個東西，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否認它是真實的。大凡一個有機

體的生命，不能完全由病的過程來構成的，因為即令這些病的過程，也還須有健康的生理現象之存在，這種現象對於生命本身之保存是必不可缺的。與階級鬥爭及其暴力，罪惡，及背叛真理這一門病理學同時並行的，還有社會生活的生理學。

當馬克思確定了階級的真實性之後，我不知他根據何種論理的基礎，竟駁斥社會的真實性，且進而否認人格的真實性；他以為這兩者不過是階級的一種機能，它們的存在及其整個生命，都受之於這個統一的整體的。人沒有內在的性質，他在本質上只是附屬於階級的一個經濟的生物。但當將來社會主義實現以後，社會已被稱為真實的了，而人格呢，照馬克思的意見說來，卻決不會變成真實的，也許永遠不會真實的。他以最令人吃驚的方式，將唯名論及原子論與普救論聯繫起來；階級這一個最高的真實性證實了自己，然後必須轉變為社會「集體」之普遍的真實性。對上講，社會是階級的機能，對下講，人格是階級的機能，總之，階級是本質，是 *Noumenon*（實體），是物自存，而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偶然的事物。

但是階級可以理解爲唯一的與原始的真實嗎？馬克思對它簡直造成了一個神話，他關於宇宙的唯物論的見解，決不能爲這一神話辯解。依唯物論講來，階級只是個別原子的結合，這些原子爲維護它們自己的利益而鬥爭着，各個原子的人，因其公共的經濟利益及其在物質生產中的關係而相互聯結起來的，將階級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即它發生於其各個部分之先，且能決定它們的生活，那倒是一個統一體與原始的真實體，但它是存在於心裏而不在於物質的存在中的。因此，它祇能像有機體式地而不能機械式地來加以研究。有機體之異於機械，乃在於有機體是先部分而存在，且決定其部分之生活的；而機械則適得其反。不過就事物之全體來加以思索，決非唯物論者的心理習慣，當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的唯物論是辯證的而不是機械的之時，他們主張一種論理學上的怪物，即辯證法與唯物論的聯合。黑格兒曾在墳墓中轉轅，柏拉圖將在陰影裏震顫。假使你是唯物論者，假裝辯證法家是沒有用處的；你是哀爾維次與霍爾巴黑的私生子，是布黑內與毛來孝脫的弟兄。所謂「辯證唯物論」也者，爲了煽動是好的，但對於哲學都不相宜的；因爲哲學是

一個貴族。不過馬克思雖然是一個唯物論者，他卻不失為辯證法的著名的大師，他用以很有力地暴露階級間的鬥爭。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可經驗的實際狀態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工人，從他們的智慧與利益上，很可以分別出來的，例如印刷匠與礦工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各民族的情態，也是十分不同的，例如英國人被組織於職工會之中，而德國人則團結於社會民主黨。至於工業的與財政的資產階級，也有極不同的種類，事實上，這一心靈構造上的不同，到處都可以發見的。經濟体系的本身，頗能為民族的心理特點所改變，彷彿在法國，那裏產業的落後大半原因是由於法國人對於金錢的看重不願冒險。不過在那可經驗的現實界中，確乎不能找到像馬克思所想像的那種單純與整個的無產階級；這是心裏的一種虛構，思想與神話，但它也似一切重要的神話一樣，並非與實際完全無關的。將階級看成爲有機的真實體，雖然也能找到相當根基，但社會與人格之被視爲真實體，卻有更大的理由。階級只是社會過程中的一個機能，與它有關的一切事物，只是社會的一個構成部分，它從屬於人格，我們決不能

將它們的關係倒置。

在這裏我們遇到了馬克思最大的矛盾點。他指示出資本主義將人的關係變成爲物的關係。這是最著名的發現與最確實的真理。但是這卻表示了馬克思主義在經濟的與物質的世界之外，認識了活的人與創造性的生物，以及它能重視他們的能力與工作。經濟的過程乃是生物的鬥爭，同時這過程又構成了他們的創造活動。人世間根本沒有什麼實質的經濟真實體，因此，一切的經濟範疇，都不過是歷史的範疇，而不是像古典派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主張的永久的原理。

但是這樣來解釋經濟生活，是與唯物論適相衝突的，因爲將人變作物的。正是那唯物論呀！把人祇當作一個物件，把人的工作當成商品，正是資本主義中唯物論精神所產生出來的一種說法。對於此種情形，決不能以唯物論來反對，祇能以人格的體系來對付，因爲這體系能以活人的本來面目去看待人，且不致將人們降落爲工具與物件的狀態。能反抗此種轉變的，是人格而不是階級，至於無產階級則更能使這一轉變發展至極端。階級存在的本身，

就是那轉變的一個象徵，因為階級是一種事件，而不是真實的存在；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卻要無產階級相信他們自己祇是一塊物質。馬克思主義是反抗資本主義的，但它既係由資本主義中產生，故帶着它唯物論精神的致命點。它說：人類的品格是階級的機能，而階級又是經濟生產的一種機能，所以真實界不是爲活人所構成，而是生產的經濟過程之產物。祇有用基督教的世界觀，而不是唯物論者的世界觀，纔能反對那由人到物的轉變，反對人類的變形，這一變形係在階級以及物質生產力之發展這些名義之下發生，祇能在人的名義之下加以駁斥的。但是在馬克思主義中，無論在過去與現在，都沒有人的地位。難道我們將來能在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人嗎？

不能的；後來祇能找到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完全唯理主義化的人類。在這樣的人身上，你再也找不到任何人格的與非理智的東西，一切都是深入社會與理性的，他再也不是人，而是由階級鬥爭所產生的新的東西了。爲要誕生一個新的人，一個真正的人，那他必須在過去就已經是存在的了，他一定要比任何簡單的階級之生存，更具有深刻的真實性。一隻「階級的猿」，決不

能進化爲人類的人。

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識中，未來與過去根本不同；過去是進入到『超歷史』的序幕，這『超歷史』將是歷史的終結。過去被必然所統治；未來將是自由的天下；過去是爲一種不合理的經濟過程所決定，在此過程中，社會的人還不能成爲主人，至於未來則被有組織的社會理性所決定；在這兩者之間，劃分着二條鴻溝。馬克思以爲無產階級行將導入的社會主義時代，其哲學並不是經濟的唯物論而是黑格爾的沉埋論（Panlogism）（即認理性爲唯一真實的一種學說——譯者）。社會主義化的人，將克服自然界與社會的非理性的力量；生活將嚴格地被管理着與組織着，不會再似過去社會中那樣依賴着不合理的力量了。階級鬥爭與辯證法的社會過程將在理性的勝利中告終。必然將產生出自由。

馬克思將合理的與不合理的成分綜合起來，簡直是最矛盾與最荒謬的了。在目前蘇維埃的實際情形中，這一荒謬就實現出來了。雖然俄國的共產主義者自詡爲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們都_不用經濟來決定政治，而

以政治來決定經濟。這一點常被那也自命爲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門雪維克（註五）所指摘的。不過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別一個成分，較爲忠實，即他們對於未來的態度。在過去，政治常被經濟所規定，即是說，被無組織的與不合理的原始力量所規定；在將來，情形將恰巧相反，換句話說，即有組織的社會的理性將統治整個世界。俄國的共產主義者以爲他們已經達到了這一個將來，已經在享受着自由的統治了。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是那沉理論的機關，它是社會理性的化身。但是，無產階級的滅功，階級的取消，這一有組織的理智之建立，將是人的勝利嗎？過去他被階級與階級鬥爭所壓服，將來還會生存嗎？

不會，他將確切地消失，他的後面祇能留贖一個『集團』。黑格兒哲學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給我們一個著名的反人格的主義，而這一主義正爲馬克思主義所承襲。無產階級已經不願局限於一個階級的地位了，它一定要成爲唯一的人類。這就是爲被壓迫與被剝削階級而進行的階級鬥爭之最終的結果。這一點卻使我們觸着了馬克思主義的及其階級學說的核心。

馬克思生活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他觀察了該社會階級間的矛盾；他對它的觀察常是完全正確的。雖然法蘭西的歷史家提雷(Thierry)與基佐(Gизоt)等，已經提到過階級鬥爭，但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中，得出某些真實的結論，仍不得不推馬克思為第一人了。但同時，他那無產階級的理論是非科學的，而是宗教的，救世主的，神話式的；他創造了關於救世主無產階級的神話，他認為這是唯一能免於剝削之原始罪惡的階級，是上帝的選民，是人類的救主，它賦有一切的德性。這神話與經驗界實際進行的階級鬥爭大為不同。

無產階級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受壓迫與最被遺棄的階級，因此，它特別引人同情，且應該將它從這一重壓之下解放出來。但是這一點卻不能保證它的一切德性；它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有好有壞，有智有愚，有高貴有下賤，它也似其他的階級一樣，壞的與愚的總占着優勢。它在數量上優越這一個事實，就已定下了某些罪惡的成分了。世界上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什麼「好的階級」；所謂好，智與高貴，不是階級而是

人，至於這些德性卻是超乎階級，不為階級所限制的。一切階級都是過失，一切階級的心理都是有罪的；一切階級的孤立都是罪惡，一定要在精神上和它鬥爭；我們看見罪惡的意識被階級的利益與貪婪所麻木，是最感覺到憂愁的。

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的觀念，不一定和實際的無產階級相符合，馬克思主義所繪的關於無產階級的肖像，與它自以為代表的經驗界的工人階級，不很相像；在經濟的特徵上雖有幾分類似，但在精神方面則完全不同。正是在這個地方，馬克思不再是一個唯物論者，而是極端的唯心論者了；在不再決定意識，而是馬克思的「意識」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存在」。他關於無產階級的教義，乃是全部階級鬥爭學說的中心，且支配着關於其他階級的觀念。這教義完全牽涉到道德價值的學說。他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分別，就在於善惡，光暗，優劣的不同。在這個時候，馬克思假使不借助於道德價值，那他決不能得到階級的觀念，因為對於階級，他是時常用價值來加以考慮的。理論上與口頭上，他是一個非道德主義者，但在實際上，他

卻浸沉於過度的道德主義中的，這個道德觀念，在其階級鬥爭的全部理論中頗為明顯；他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中，看到了奧爾摩斯神（Ormsz）與阿立曼神（Abriman）之間的鬥爭。他將根本的一元論與根本的二元論聯結了起來。

不過馬克思的道德價值學說，與基督教的恰巧相反。他不僅說明了各階級間惡毒的與仇恨的戰爭；他並且很高興看到這個現象，他對它歡呼，稱之為最善的事物，因其結果必然會使那救世的階級得到勝利，而整個的生活，又會因此鬥爭而得到合理的解釋。在這裏，他所有的唯物論，原子論，唯名論都消失了，讓位於另一個馬克思，他是一個唯心論者，汎理論者，道德家，宗教家與神話的追造者了。他的階級觀念祇具有一件科學的外衣；其實那道德價值的思想，才對他發生了決定的影響。他醉心於剝削及被剝削者與剝削者間的鬥爭這一個事實，但他由此所得的結論，卻既不是科學的，又不是經濟的，而是道德價值的與倫理學的。他企圖用剩餘價值的學說來說明剝削的事實。他以為這學說完全是經濟的，可是他包含着一個有力的倫理的

成分，具有決定的意義，剝削激起了馬克思的憤慨與怒斥，但是爲些什麼理由呢？爲什麼剝削值得斥責？爲什麼它應該懲罰？

毫無疑問的，馬克思在此地是從一個倫理的前提出發的，由此他得出一個結論，說剝削是一種惡行與罪孽，甚至是最大的惡行與最壞的罪孽。他並不用科學的方法得到這一個倫理的前提，也不是從經濟中去借得它來的。階級鬥爭的問題不完全是社會的與經濟的，同時是，而且一定是，倫理的；但是這兩種成分必須區分出來。而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與階級鬥爭的學說，卻是兩個概念的混合，卽：經濟是『倫理化』的與倫理是『經濟化』的。不過他的道德主義是顛倒的，甚至是魔鬼式的；他覺得『惡』是走向『善』的唯一大道，增加黑暗是得到光明的唯一方法；人與人間的親善，平等與友愛，是由妒忌，仇恨，惡毒與一切殘忍中產生的，在暴力與壓迫的火車中，會運來了自由。在某種辯證的方式中，罪愆會轉變爲善，黑暗會變成光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災害一定要愈弄愈壞，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光榮才能建立起來。

馬克思將救世的無產階級來代替那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神話。他不能在

善惡與強弱的複雜方面來看那真正的無產階級，而企圖重新創造一個無產階級，由此，他表示出神話思想的力量（雖然是與唯物論相矛盾的）；並且在相當範圍內，他是成功的。這就是他在社會思想及其成功的歷史上之意義。雖然，他並不懂得『勞動者』是很容易變成資產者的，而且在工人的下意識中，時常被中等階級的思想及其本能所感動，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勞工運動，已經給予了我們很多的例子。勞工階級與社會主義對於中等階級及其精神的反對，是極為相對的。嚴格地說來，除了當革命的幻夢成熟之時，此種反對是沒有的。在目前，歐洲的社會主義者並沒有此種反對的情緒，尤以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爲最，他們祇不過在名義上還堅持着要人家尊重他們爲馬克思主義者罷了。祇有共產主義者才表示了反資產階級的情形，但即令他們，也只是暫時表示了一下。共產主義是在大戰這一沃土上顯現出來的革命精神之一個新的發長；但是這一精神，也難免受着中等階級對於權力與安適之貪婪的迷惑。勞動者很確實地要求成爲資產者，這在社會的見地上來加以觀察，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是有權那樣做的。至於對那資產階級的精神能表

示出強烈的厭惡的，倒不是勞働者而是許多知識分子與其他高級文化的代表者，他們希望能看到一個新的時代，那時的人們將從資產階級的精神中解放出來。

亨利德曼 (Henri de Man) 對於工人階級知之頗審，曾以公正及批評的態度來加以說明，(註六) 工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狀，並不一定像馬克思在其『愈壞愈好論』中所要求的每况愈下。勞工運動是一種經驗界的階級鬥爭，它給工人們爭得了較善的生活，但同時又使他們成爲無望的資產者。法國的『左派』社會主義者確實在埋怨工人對於現狀的滿足，說他們不要革命，這也就說明了革命工團主義在法國沒落的原因。英國勞働運動的情形也是如此。職工會增強了工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力量及其社會的意義，因此減弱了革命的與反資產階級的精神。社會主義已經確定地成爲擁護良善秩序的政黨，而實際的改良主義分子在社會民主黨中占着了上風，革命的與救世的熱情，卻就此消逝了。

對於這種情形，共產主義者最爲憤恨，但他們自己祇不過是明日的或後

日的資產者。他們能和馬克思一樣，以革命的精神來和資產階級鬥爭，但這是一個不穩固的與過渡的階段，在鬥爭中的一個短短的時期；情形會馬上安靜下去，生活立刻又要開始建立起來，而資產者的精神重新出現了。即令在蘇維埃的俄羅斯，情形也是如此。在那裏，在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心，現在也無疑地在形成着一種新的資產階級，這資產階級比過去的還要殘酷，還要貪生。

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積極目的，很明顯的是中等階級的；這就是說，他們的目的仍舊是那工廠，權力以及物質富足的那個討厭的樂園。這一點，決沒有排除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中的積極性的真理。不過用一種經濟的制度（這武器祇能用以反對資本主義）來和資產者的精神鬥爭，那是沒有用處的。要反對這種精神，祇能用另外一種精神；因為一個階級的經濟權力不能抵抗一種精神，而精神的權力卻能抵抗它。在這一意義中說來，一切階級的智慧，甚至無產階級的心智，都是資產者的，都具有剝削人的願望。明天的主人，不會比今日的或昨日的主人，減少些資產者的氣味，十九與二十

世紀的歐洲資產者的精神，大大地減弱了精神的力量；他們所關心的祇是那目所能見的事物，而否認一切無形的東西。這在事實上就是代表了那種「經濟主義」，被卡爾馬克思所完全吸收，且賦與絕對性的那種「經濟主義」。

在我們看來，共產主義祇當它還是祕密的，因而它要求人們的信仰，自我犧牲與熱情的時候，才是反資產階級的。一等它現實化且能被一切人所能看見之後，它就和資本主義一樣地成爲資產者的了。資產者的精神乃是一個永恆的原則；是它產生了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創造它的；不過資本主義很忠實地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精神狀態。

(註一)見杜克海姆 (Durkheim) 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態。

(註二)見辛墨爾的社會學。

(註三)「經濟人」爲古典經濟學中所假定之人，假定他的一切的行爲與思想，是以經濟的利益爲依歸的——譯者。

(註四)見拙著論人的歸宿；關於托羅倫的論文。

(註五)布爾雪維克的歐派——譯者。

(註六)見其所著超出於馬克思主義之上。

第三章

基督徒對於階級鬥爭的估計——基督徒對人格的態度

基督教決不可在那偏頗的口實之下，即以爲承認了階級鬥爭，就無異暗示了一個關於歷史的卑劣的見解，因而否認這一鬥爭的存在。其實從基督徒的觀點來說，對於社會界的唯實主義的態度，無所掩飾地注視真實，以及在認識事物時的客觀性，無疑地是具有道德價值的。我們不得不承認階級的衝突在歷史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社會中有剝削的與被剝削的階級之存在，而且階級的心智，顛倒了真理與毀壞了理想。基督徒的意識不贊成世事的這一方面，它將它視爲值得斥責而必須克服的事情。

但是，這樣的斥責，同時卻不能將眼睛閉了不看見事實，或者以輕蔑的態度從這鬥爭中退身出來；基督教徒生活於罪惡的世界中，一定要擔任起它的重負，他們決不能從戰場中偷跑。基督教也不能建立起一個適合於一切的人，一切時與一切地的經濟制度；教會的職務，不在於宣傳政治的與經濟的

真理，他讓世人自由地去從事社會的創造。但是人與人的關係，卻屬於它的判斷範圍而需要它那積極的批評的。競爭中無情的自私，人變爲物，人的勞働變爲商品，都是爲基督徒的意識所不能容忍的。

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事情卻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

基督教應該從宗教的與道德的觀點，斥責那人被人，階級被階級的剝削；它應該保護工人與被剝削者，因爲基督徒的信仰，對於人格與人類的靈魂，覺得具有無上的價值。因此，它的斥責就不能以此爲限，對於那將人格及靈魂作爲走向非人的經濟過程之手段的制度，也必須加以斥責。

所有這一切，一方面與資本主義有關，另一方面則對共產主義而言。

經濟爲人而存在，並不是人爲經濟而存在。基督教對於那種樂觀主義的觀念，即以爲經濟力量最強與最成功的人，就是最好的，或以爲財富乃對於善人的酬報那種觀念，最不能相容。基督徒的意識最容易，同時又最有系統地承認凡歷史的與經濟的諸範疇，都不是永恆不變的，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諸範疇，則尤易消逝。社會之精神的基礎才是永恆的，其他的一切都不過

是曇花一現。私有財產固然有某種本體上的核心(Ontological nucleus)，但它的形式卻是歷史性的，因此是可變的與可逝的；基督徒假使把它作為絕對的東西，那是一種罪惡，尤其是因為私有財產在我們這資本主義的制度下所具有的性質，極難叫我們去發現那本體上的核心。事實上，資本主義毀壞了私有財產，將它弄成爲一個虛空的名稱。財政家的資本是集體的而不是個人的。結果則無論財產的主體或客體，都沒有的確的規定。

因爲基督教所關心的是實際而不是空名，因此，基督徒的意識在經濟生活中所最看重的是經濟生活的真正基礎，即勞動。在基督教方面看來，勞動是神聖的；它保障勞動，保護由勞動所增殖起來的財產。福音書告訴我們說：「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見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節），聖保羅宣佈道：「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見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第十節）。當古代希臘羅馬的世界輕視勞動，將它視爲奴隸們的事情，那時的基督徒卻尊重勞動與勞動者。最高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在人間的職業是一個木匠；他是屬於「勞動階級」的，他的門徒也是如此。單單這一個事實

的本身，就已使工人們的社會地位神聖化了。在基督教的經濟學中，根本問題是集中於勞働之上，對於勞働的態度，決定了我們對於社會階級及其鬥爭的態度。

嚴格地說來，從來不會有過真正的自由勞働；祇有手工業匠人的勞働，才能相當地說是自由的。在過去，勞働之最占優勢的形式，常是奴隸與農奴。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勞働被稱爲自由的，但這「自由」一語，表示出何等變關的意義，因爲資本主義祇將一種新的與變相的奴工形式來代替了過去存在的形式。勞働的人，即是說，沒有生產工具的人，祇能出賣他的勞働力才能生存，他是不被任何人所強制的；他同資本家一樣享受着同樣的政治權利，他參加國會的選舉，但在實際上，他的自由，祇當他不願去做工廠中痛苦的與令人墮落的工作時，有自由去餓死的權利罷了。勞働自由的意思，就在於一個人的勞働，可以像商品似的出賣。而這「自由」，一定要在饑餓的威脅之下才能實行的。購買者依據着出賣者那種無可奈何的情形而決定其條件，購買者可以等待與選擇，而出賣者卻不能那樣辦。

社會主義者時常奢望着要使工人及其勞働得到自由，但是令人注意的乃在於他們也和資產者自己一樣，再不企圖在他們的觀念體系中，說明勞働問題的本質。他們企圖把工人從過分艱苦或過分長的工作時間中解放出來，但他們的內心中卻並不將勞働的本身視為神聖；尤以馬克思主義為然，他所看重的祇是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立起來的勞働形式。這彷彿是破壞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塊暗礁，因為社會問題也者，首先是有關於勞働組織的事情，因這組織而勞働得以切實地解放出來。可是共產主義對這問題的解決，卻是由國家來建立一種強迫的勞働——一切都講過而且一切都做過了，但是工人的經濟權益，卻並不會被任何社會制度所保障，因為所有這些制度，都把社會置於人格之上；這一點，即令在資本主義中也是如此，因它關於個人企業與私有財產的論調，統統是虛偽的。勞働問題是宗教的與精神的，社會之未來生活，與此問題之解決有着密切的聯繫。勞働的舊有紀律，在某種方式之下，都是奴性的，如今都已經，或已在衰落了，將來它們究竟能否恢復，那是極可懷疑的，因為此後的工人階級將拒絕無論明的或暗的任何形式的奴工了。

在此地，就極迫切地引起了一個宗教中人格對於一己或他人勞動的態度問題，即關於勞動的論理學，它與宗教對於人生的一般態度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勞動是一切社會生活的基礎，也是經濟的基礎，所以社會問題，特別是牽涉到勞動的問題，乃是基督教的問題；勞動的精神基礎問題，乃是社會的精神基礎問題。勞動是自然界中人的遺傳，是他不可逃避的命運；人就是一個工人，一個勞動者，他應該知道爲什麼如此，以及他那勞動的意義應該從何處去加以觀察。

單想把那比較不適宜的勞動種類除去，以及改良生活情形與縮短工作時間，那是不夠的，因爲這一切都可以用社會活動與社會改良來辦到；此外還須考慮到勞動的本身與內心對於勞動的態度；這一問題，必須是精神的與宗教的，不能就外界的理由來加以回答。這也不能離開了基督教來加以回答，除非你奴顏婢膝地將精神屈服在物質世界之前。經濟生活依賴着勞動，而勞動的本身則依賴着精神，它是在物理世界中取得了力量的精神活動；這對於手工的勞動也是如此。現在我們再回過來講到馬克思的命題。

將勞働視為物質現象，那是全無意義的。馬克思着重他的經濟唯物論，因為他所關心的只是勞働的社會形式而不是它的實質。精神就是活動，創造與自由。但在物質界中，精神的活動與創造逐漸減少，它的自由則與必然的力量聯合起來了。勞働不一定是創造的，勞働問題中最迫切的一點，正是那非創造性的工作，此種工作的本身時常是令人不能接近的，而從事於此種工作的人，會感覺到毫無意義。艱苦的經濟工作，由罪惡所產生的，人們祈求未來的那種積極的表示，常能使人想起他之被天國所放逐，伊甸園經濟之無可挽救的失去，他所能獲得的物質財富之貧乏。我們可以，同時我們一定要減輕勞働之社會的負擔；假使我們以基督教的刻苦主義為口實，主張維持勞働的現有狀態，那只是一種偽善，而且是資產階級對於勞働的態度。

與社會的水準同時存在的，還有人格的水準，不過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共同的尺度。勞働的羈絆乃是人之人格的命運；因為這樣，勞働必須以宗教的態度來忍受它。如果從內心中來考慮這個問題，勞働乃是生命中的一個永遠刻苦的成分。人為物質界的必然性所強迫而勞働；但因人是一種自由的精

神，他能把這一事實作爲其精神的道路，作爲個人的刻苦，作爲對一種超人事業的服務來接受它。

社會主義「集合體」中的勞働紀律問題，頗爲複雜，迄今尚未解決。在這樣的社會中，勞働的精神問題，及其自由的接受問題，倍增困難，因爲在那裏假使沒有勞働的某種內在動機，則工人將必被軍事制度所強制而勞働，世界將成爲軍營了。唯物的社會主義希望（我不很明白原因）人性復活，他們覺得這將是新社會組織的一種自動結果。但因精神的槓杆尚未發現，這祇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循環論法。

當然，勞工問題只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講到整個的社會問題，在基督徒看來，首先是對於勞働的態度問題，即從權利與義務這兩方面來觀察勞働。另外還有一方面，基督徒也必須予以判斷的；即關於經濟生活之最後的客觀原因，經濟計劃，以及克服資本制度之無政府生產狀態的組織等問題。至於資本制度中的無政府生產，那是根據於個人利益的交互作用，與各種相反力量之瘋狂的競爭與衝突。

資本制度因產業的合理化，以及商品與經濟財富的極度增加，產生了失業，使幾百萬人（知識的與手工的勞働者）祇能在街上躑躅，受着貧困與飢餓的罪；這是必須除去的。這種制度雖然一般地增加了財富，但仍激起了反叛的憤怒；雖然有許多缺乏物品，但它爲了經濟的利益起見，不得不毀壞那『過剩』的物品；它孕育着可惡的戰爭；它被追求財富貪慾所迷，這貪慾已經轉變成殘酷的感情；它使人生成爲空虛，甚至那統治階級的生活，都因成爲經濟賭博的附屬品而失去了意義。這樣的制度完全是瘋狂的，無論就良心或理性上說，都應受到懲罰。

在原則上，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少內部的諧和性。它創造出像喀萊爾（Carlyle）所諷刺的『着魔的錢』，它是一切制度中離開真實最遠的一種制度。它是虛幻的，充滿着謊言，它是人類歷史中最反常的制度，因爲它將活的人服從於非人的結構，較任何其他其他的制度爲甚。由金錢，銀行與證券交易所組成的財政界，自成爲一個神祕的世界。這一世界之可以稱爲神祕，甚至就金錢所具有的強烈的神祕主義而言就已經足夠了，例如來昂勃魯衣（Leon Blum）

在其作品 *e Saïnt pat les Juifs* (猶太人的幫忙) 中，描寫得極其出色；因為這金錢既非神聖的，亦非自然的，但它卻像惡魔似的，暗中統治着世界。勞動階級並不是這一虛幻世界的唯一受難者，一切都受到它的害處；人們在這世界中死去了，他們的影像也就模糊下去。現代的資本家只是瘋狂地追求着市場，他們自己也成爲那粗野的非人的力量之受難者，他們爲這些力量服役。他們沒法繼續，但他們又不能自止；他們的精神業已墮落，因爲他們不能再思索那神聖的事物。

假使以爲現代的資產階級，卽資本主義的英雄與世界的主人，過着一種不動的與懶惰的生活，那是絕對錯誤的；祇有那陰謀煽動者的成見，才會企圖去擁護這樣的說法。事實是相反的，他不停不息地勞動着；他繼續不斷地從事於他的業務，沒有一分鐘的閒暇。但是問題的重心乃在於知道他那職業的性質，他以怎樣的精神從事此種事業，及這些事業對於他的靈魂能有什麼用處。當然，無論那一階級，都不能完全過着寄生的生活；這樣的懶惰是反常的與腐敗的；但在資本主義之下，統治階級始終在得失成敗中渡着日

子，他們那勞動的本身，與基督教的勞動概念不相符合，且有背乎每一基督徒都應具有的對於人生的態度。

資本制度是一切制度中之最不穩定者；它很容易發生危機與災難，無論誰，都不能預知明天將發生怎樣的事情，因為在資本制度的後面，潛伏着一個足以耗竭一切的貪婪，它在產生着無窮的紛擾。資本主義世界不能給任何人以幸福。它的不固定與缺乏保證，竟使無產階級的前途也與資產階級的一樣地不可靠。百萬富翁，大事業的所有者，巨富的銀行家，一旦可變成赤貧；它是一種冒險與投機的制度。它具有很大的活動力，施展着極大的權能，且能發展生產的物質力量；但它卻毀滅了人，同時破壞了僱主與僱員的靈魂。

這樣就是財神的王國，基督教不僅從勞動階級的，同時從資產階級利益的观点，將它加以斥責，因為他們在精神上也屈服於一個需要拿人類作犧牲的神。基督教號召我們丟棄那虛偽的世界，重新回復到可靠的真實。

這個意思並不是說：基督教輕視一切經濟的與工業的發展，要求完全回

復到商業與農村的經濟；它所要求的是要建立一種價值的教會政治，與經濟生活之從屬於精神的原則，即是說，要壓制那經濟生活之道德的自治。祇有在這個條件之下，人們才能從虛幻中解放出來，重新回復到真實。

當我們嚴厲地評論過資本主義的制度，且列舉其缺點，與醜陋的生長之後，卻並不像馬克思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似的，以為就此已講盡了它的內容。生命的複雜是無限的。就是資產階級，也並不是由十足的壞人來形成的，對於它，我們也應該用一種人的態度與人的評價。但在同時，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精神，卻已經在我們這時代的全部生活上，蓋上了一個不祥的標記；它甚至決定着社會主義者運動的本身，雖然他們企圖在駁斥這種精神。

世界上有一些絕對的價值，它們不發源於社會，但在社會生活中表明出來；對於這一些，基督教不能加以忽視。這些價值中之最主要的，厥為人格的價值，它是生命的精神中心；其他則為勞働中精神，良心，思想與創造之自由的價值。凡社會制度不了解或否認了這些價值，那它就值得斥責。但這當然也不是說，實際活動的基督教，它那判斷與認識，從來是被這些價值所

決定時。以前曾經有過神權的社會制度，在西方有教皇專制主義者；在東方有專制教皇主義者，它們都窒害人格，否認良心的自由，且虐待靈魂；不過這一切虛妄的基督教制度，遲早都被注定了滅亡的了。就歷史來看，俄國的東正教與大商小賈有着密切的聯繫；法國的天主教與貴族有關，德國的新教則與國家主義及中等階級不可分離。但就價值的觀點來看，人格卻超出階級之上，同時又超出國家及經濟之上。就人言人，則他是不屬於任何階級的，僅因偶然的環境不同，因所穿的「外衣」各異，才分出資產者，貴族，農民或無產階級來；其實就其內心的存在而言，他們同屬於精神界與永恆界的。

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基督教的絕對價值的裁判之前，同樣地要受到懲罰的，因為他們兩者有一個共同的原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將階級置於人格之上，以為人祇是社會的一種附屬機能，至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思想，對於人也採取同樣的見解。無論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我們都能發見那非人格的「集體」，同樣地統治着。這樣的一個集體，祇能準備過渡到其他的另一個集體——這道理正是馬克思所告訴我們的。基督教應

該用它自己固有的關於價值的聖經，來了解社會問題，它珍視那融和親愛的公社與人格的博大，但它坦白地否認那非人性的與非人格的社會集體。

社會問題中首先談到的是人，因為祇是爲了人的緣故，才來解決社會問題的。階級是容易消逝的，經濟的財富更是生滅無定；人的靈魂才是永久的，祇有這個魂靈，才能站立在上帝的座前。固然要解決我們這社會問題，決不能完全撇開了階級鬥爭不管；但是這個解決法，決不能祇在經濟的與物質的研究中尋找（如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那問題同時又是精神的，宗教的，道德的，教育的與技術的；一般的人民必須要有精神的再生與教育，才能解決社會問題。除非你更深刻地來研究這個問題，否則，就有一切改革與革命的大危險，其結果祇能是欺騙與虛僞；瓶子雖然換新了，可是裏面盛的仍然是酸腐的老酒。況且問題又要牽涉到人的新魂靈之誕生，這是不能機械地產生出來的。假使人們對於勞動之精神的與道德的態度，不經過激烈的改變，那末勞動的規律是不能夠建立起來的。

歸根結蒂地分析起來，這時代的社會問題是歷史詭辯論的(Historiosophie)。

它含有一種末世論 (Eschatology) 的成分，它對我們的文化給了一個可怕的判斷，對古代的世界又予以斥責。就馬克思看來，這問題主要也是歷史詭辯論的；新時代行將到來，但因其樸實的唯物論之故，他不能正確地予以解釋。社會主義中這一歷史詭辯論的性質，最為德國宗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鐵里希所了解，他並且將這一性質同末世論聯繫起來。他將「Kairos」這一個字來解釋它們的意義與關係，這意思就是說：消磨時間，將永恆分割成時間。(註)

(註) 見 Paul Tiliak 著：Kairos，論精神的狀態與精神的過程。

第四章

真正的與形式的自由——人，公民，生產者——自由與強道

法國大革命中人權與公民權的宣言，並未予「人」以多大的注意。他甚至被「公民」所擠，退到後面去了。所謂「公民」主義，則被人了解為政治的動物，他的權利則了解為形式的權利。因此，這宣言很容易墮落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與資本制度的憲章。再則，依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世界觀說來，權利是與義務嚴格地區分着的，所以它祇表示出利益與要求。但在實際上，權利不能與義務分開（如資產階級對它的估計就是如此，它內中隱藏着一種階級的貪婪），因為這兩者間彼此牽連，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權利的本身就是一種義務。

宣言對於基督教的意識而言，比它在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中，具有很不同的意義。在基督教中，享受絕對權利的不是公民而是人，人在其自由的精神存在之地位中，能享絕對的權利；而這些權利卻不能與他們相當的義務分

開。人的自由之本身，不是要求而是責任，它所求的比所予的爲多。上帝要人必須自由；當人負起那自由的重負時，正猶一個青年人，當成年之時，負起他的特權與責任一樣。所以重心之所在，不是公民而是人。公民這個概念是次要的與從屬的，它屬於政治的社會，那裏的真實情形都被巧妙地掩蓋着，所以很難發見。人的概念則相反，它是屬於精神界的，人之絕對的與不能廢棄的權利，即發源於此。但是那個關於權利的宣言，卻不能自限於宣佈那精神生物——人——的權利，它必須同時牽涉到次等的與從屬的存在。

這就是經濟生活之真實，代替了精神生活之真實的緣故。

在經濟生活方面，宣言講到了生產者與工人的權利，這一個概念是屬於經濟的，並不屬於政治的社會；但它無疑是重要的與嚴重的一方面，在這裏，人的生活依賴着物質的程度。聖西門，以及繼他之後的蒲魯東，在一種不同的方式中，都提議以生產者的權利來替代人的權利；這種提議是從一種社會觀出發的，它把社會首先看成是勞動的組織；事實上呢，生產者確乎比公民要真實得多。這樣，我們就進入到勞動的真實領域了，我們將就它宗教

政治的一切品級加以考慮，這就是社會主義者一般地拒絕加以考慮的。

不過那宣言將生產者的經濟權利，與人的精神權利分開，它使人類奴役於物質世界，且在數量上將減低文化的水平。從道德價值的觀點來看，關於品級與價值的宗教政治，首先是大主教對於精神的適合；其次是經濟的思考；最後才是經濟的工具——政治。政治祇被人們有意識地將其從屬於經濟，才能不致墮落為一個隱藏着商業利益之賭博的虛妄的東西；至於經濟本身則又須從屬於精神的原則。社會一定要了解為勞動的與創造的，它應建築在精神的與經濟的基礎上；它祇准蒙受着極小限度的政治影響。自滿自足的政治的吸血鬼，吸盡了人類社會的活力，建立起一個虛幻的結構。它決不是替生命與生命的利益服務，而是使它們臣服於自己。因此，關於政治，必須要有一個自己否認自己的制度，而精神生活與經濟生活之真實方面，又必須使其立即出現。

這就是決定我們對於社會階級之態度的。取消了社會等級之後，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確立了公民權與政治權利的平等，由此所得到的社會結

果，我們並不能看重，因為形式與實際之間的不符，太覺顯著了。現代的民主主義雖然承認了政治上的平等，但是貫徹全部生活的經濟階級的不平等，確乎是很大的。

這祇證明了經濟比政治要真實和基本到許多倍。

在民主主義的社會中，權利宣言的意義並沒有達到很深的程度，它並未堅持真正的經濟權利。財產權是被承認了的，而且受着保證，但這是擁有財產者的權利，並不是窮人與「工人」去取得財產的權利。社會不會承認那一切權利中最真實的權利，即生活的權利，因為富裕的社會中可以有失業那樣驚人的現象，所以我們不能承認這社會中有任何被認可的勞動權利。究竟那被公認的一切公民的能享受的形式自由，值些什麼呢？它的意思只是說：許多人在害怕着明天，許多人在受着飢餓與貧乏之罪，而同時有些人則享用着大量的財富。形式自由與實際自由間所存在着的不符，乃由於這一個事實，即經濟界中的自由，不是被形式所決定，而是由物質，即生產工具與生產方法所決定的。當資產階級的演說家，為反對社會主義的罪惡而大放其為自由

作辯證的感情與漂亮的言辭時，表示出這個偉大的名詞（自由），可以如何地被人濫用，以及它能解釋成多麼不同的意義呀！

我心中時常記起一個故事，這故事，假使我沒有弄錯，是屬於魯易·勃朗的。有一位富人，行經一輛馬車，對車夫說道：「你自由麼？」（即沒有僱定之意）「自由的」，車夫回答着。「自由萬歲！」過路者高呼着，向前走去了。誠然，對於自由一字作這樣的解釋，那是十分可以的，並且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這是最好的一種解釋。不過我們應該用社會生活中自由的真見解來反對這種解釋，自由不僅要使人能獲得生活，而且要使他能應用其創造力，從事於真正的職業；總之，真正的自由需要這樣一種社會的組織，它能替每一個人保證着工作與創造的機會。這自由中既不能有社會的等級與階級，也不能有代之而起的行業與職業；一個社會，假使它的基礎是依教權品級所組織的勞働，那它必然要產生一種新式的組織，它像是政治團體的原始細胞。所有這一些，包含着一個關於勞働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論社會主義的勞働概念恰恰相反，因後兩者的概念祇重數量而不重質量。

機械性的平等，完全爲基督教所不取，因爲它與人類的本性不合，且能毀滅這個本性。等級與階級的除去，這意思並不是要產生一個人工的一致，使最上所區分的宗教政治的品級加以剷平與否定。完全相反：它的意思只是要恢復人類在宗教政治中的真正品級，反對那由階級制度所發生的傳統的象徵的從屬。要這樣，我們才能對人作一種本體上的估計，才能從他的本質而不由他的財勢來估計人。

要知人體的美，必須裸體來看；基督教也以同樣的道理，主張一切真實，必須脫去其人工的裝飾。祇有那以行業，職業與創造性的職業所組成的社會，廢棄了等級與階級的制度，才能除去空幻與虛僞。但這還不夠。那社會中爭權的惡念，足以產生吸血主義，粗暴的欺騙，與政治奸詐的，也必須盡量加以剷除。在這個爲人們所艱苦探求的新社會中，一切質量上的宗教性的品級，還是會有的，不過身世與財產上的貴族，如今已讓位於工作與創造，才能與職業上的質量的貴族了，這是完全屬於人性的貴族。在這樣的社會中，自由與愛，將是二而一的東西了。

階級的矛盾及其鬥爭，已經用貪婪，敵意與怨恨的毒藥，毀壞了人類的靈魂，無產階級的靈魂，與資產階級的同樣地受其毒害與屈辱。這一個心理的與道德的事實，就足以使基督教去斥責那階級社會與階級的存在了。當然，有人會那樣來反對我們這個見解，他們以為祇要罪惡不會被最後消滅，則怨恨，深仇與妒嫉是沒法剷除的；在無論那個社會裏，你都能發見它們，這當然是對的，但依我的見解，這真理却仍舊使我們能夠，甚至使我們一定要去探求到底那一種社會制度，可以給人類靈魂以最公平的與最無私見的結果。階級仇恨傳播得太廣了，致使人們有時會失去了對於和平解決的一切希望；彷彿一切磋商都已經失敗了，都已經太遲了；爆炸物存儲得太多；事物的完整性與統一性又失去得太多；階級合作與階級親善的理想，確乎只是一個感傷的幻夢了。馬克思並沒有預見到一切，他所預言的事物也不是完全發生了的，但是那分裂現代社會的階級深仇，卻不幸而被他預言所中了。我們基督徒，雖然不贊成馬克思關於價值的估計，但這決不是為要贊成與擁護資本主義的事業與資產階級。一切階級的心智，都能窒害精神的人，且使基督

徒的良心爲之麻木，這無論對於貴族，資產者或無產者的良心，都是如此；所有這樣的心智，在基督徒看來都是非法的，因而在道德上必須加以懲斥。

就社會的見地講來，無產階級之反抗資產階級是對的；但它的心智卻已那樣地被憎恨與憤怒所毒害，而且呼吸着那樣一種文人陰鬱的嫉妒，因此，它的精神與解放人類的教主精神，相去甚遠；尤其是它茹苦忍辱地去尋求報復，更非救世者之所應有。赫勃脫·斯賓塞曾經說過：你不能希望那鉛質的天性做出金樣的行爲來；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基本真理。根據着馬克思主義的意見，無產階級必須是刻毒，嫉妒，好復仇與傾向暴力的。這正是共產主義者希望它如此的，他們的煽動正是要使它產生這樣的一種心靈狀態。但是人們如何能希望這些「鉛質的天性」，一旦能引導到一個新的較好的社會制度，能造成新的較好的人與人間的關係呢？這樣來了解的所謂「無產階級」，決不能與工人等量齊觀，因爲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天性與心靈狀態；他能成爲基督徒，能尋求那更合人性與更加公正的社會制度。

人對人，或人對全階級人的怨恨，是罪惡的，該受責罰，但我們切不可

忘記：此種怨恨乃是統治階級——貴族與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所表示的驕傲與輕視而生的心理影響。在奴隸及農奴制中所欠下的舊債，現在要來討取了，舊的罪惡產生了新的罪惡。而最值得責罰的，當然是那首先對同伴們採取不好態度的人。

惡毒的嫉妒成爲一種社會現象，現在它不僅表現於對個人財產的攻擊，而且還反對着文化，教育與知識。這無疑是罪惡的，產生此種現象的社會，那是被制定了要死亡的。道德的良心再加以社會主義者的意識，使人們再不能忍受那從來所蒙受到的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形式了。甚至那與大多數人的赤窮與孤苦相反，享受着大量財富的特權階級中人，也已開始覺得不安，而對於那使他們壟斷如許寶物的制度，究竟是否安穩與公平，開始表示懷疑了。沒有疑問的，現在所有的階級，雖然還在一種糊塗的方式之中，可是都想去解決社會問題了，有些統治階級中人，對托爾斯泰的學說（比對馬克思的學說爲甚）表示了同情。

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在世界的政治中，資產階級的自己肯定仍舊占着優

勞；不過我們剛才提到的感情上與意識上的轉變，也是寶貴的，其所以可貴之故，主要因為它象徵地表示出現代社會中所經歷着的危機。資產階級的道德與思想，正在達到頹唐的更高階段，年青一代的人們，都不要這兩個東西。人們很自然地仍舊繼續服從着他們的天性，擁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可是不幸得很或者是無恥得很，他們卻已不相信自己那些原則之妥當了。現在已經有許多象徵使我們相信這一個社會與文明的既存形式，正在死亡了，轉變的時代已經開始了，這時代還要延長許多時候。

改善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不足以解決社會問題。資本主義必須整個地加以取消。不過這首先是一個心理的與道德的問題。社會主義大概只能使這種情形增加困難，雖然在我看來，祇叫社會主義不是唯物論的，那它就能幫助着去澄清道德的空氣，且能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加親善與合乎人道，資產階級的心智與意識，正因為它像無產階級的一樣：失去了基督教的信心，精神墮墮，所以不論那些一味適應資產階級要求的假基督徒怎樣說，他們還是與基督教不相符合。當英國第一次通行金錢禮拜的時候，一定會嚇壞一些

還保有一點基督徒良心的人吧。但是在那想做世界主人的無產階級中，我們卻找不到一個新的人；當你把你一個無產者充分地加以考驗之後，他頭上的聖光環就會被拉掉了；你可以看到他還是那與舊時同樣的資產者，不過穿一件新的衣服罷了；這是老亞當成了他自己的僕人。道德的美，與肉體的美，祇存在於少數幾個世人的身上。卽令是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無神論，也純粹是資產者的，它是一「開明時期」的遺產。

基督教不以階級及其仇恨爲已足；也不贊成某一階級說另一階級的代表們，不是依照着上帝的形象而創造的。我們可以激烈地攻擊資產階級的精神與原則，我們可以爲反對此種社會制度而鬥爭；不過資產者既是人類且具有各種屬性，那我們就不可以仇恨這樣的資產者。況且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個心理法則，據此，凡恨人者，結果必與被恨者相似。

不過，就基督徒的觀點來看，假使否認任何形式的階級鬥爭，並且把它當作不潔之物來避棄它，也是虛偽的。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壓制的與被剝削的工人，一定要爲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而鬥爭；這不僅爲了他們自己主觀的

利益，而且還爲了客觀的真理。工人並不是爲了他自己，而是爲了勞動者的全體，才來鬥爭的。他那心目中的目的，在於求得人類普遍的正義；因爲這是一個階級反對金錢權力的鬥爭。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想給工人以一切形式的權利，將他當成一個原子，使他與其他的原子相等，這樣，使他孤立起來。但是孤立的工人，是無力去改善自己的地位的，也不能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他們唯一的力量與希望，祇有將自己組織成一個聯合會。這一點，在英國可以看得特別明顯；那裏的職工會，實際上在管理着國家的政治生活。目前，一般地說來，工人自己組織的權利，是已經被承認了，這一點表示了現代的個人主義與『原子主義』，已經有了某種限制；不過這些組合中之最幼稚者，就是要造成階級鬥爭的形式來反對資本來。

羅馬教庭斥責階級鬥爭，但它公然承認職業團體與獎勵天主教工人去組織工會。(註)這裏彷彿有着顯著的矛盾；因爲階級鬥爭不一定就是暴行與流血的革命；它的表現可以是十分和平的。根據着絕對道德原理的見地而拒絕罷工的權利，是不公正的；這由於它看不到那些借法律與秩序作護符的惡行，

比那因罷工而發生的惡行要大無數倍(註二)。

常態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不能了解為孤立原子的結合及其相互的行動；它祇能由合作的原則來產生的。資本主義久已不是個人主義的，而是集體主義的了；它那巨大的托辣斯與個人主義的經濟沒有一點關係。在從前，人們以妨礙工人去進行階級鬥爭，乃是人格自由的保障；現在卻不得不表示讓步，不由自願地去贊成那保護工人利益的運動了。結果則：謀資產階級社會之福利而限制資本勢力的真正力量，不是社會主義者國會政黨的努力，而是職工會的活動，於是社會也就漸漸向着工團主義的新形態前進了。馬克思所生活着的時代，與我們的很不相同，他對於資本與勞動兩者繼續發展的情形，都不曾料想到；所以他信賴這樣的制度；德曼把工團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置於對立的地位，那是很妥當的。事實上，在蘇俄已經沒有工人的階級鬥爭；共產主義採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不允許有任何不直接依存於它的職業的與行業的組合。當社會吞併了人格以後，回頭它自己又被國家所吞併了。這樣，國家能成爲一個壓迫者與剝削者，能發明一種新的奴工，能將工

人再度變爲被束縛的人，且能完成一個新的暴君制度。

統觀歷史，人格總是被壓制着的，有時被社會，有時則被國家。勞倫次·方·希坦因是將社會與國家加以嚴格劃分的第一人，他發見階級鬭爭的存在，他相信社會有一個製造不平等的自然傾向，而等級的發生，即表示了社會對於國家的勝利。在這時之前，國家是人格的迫害者。(註三)因此，他想把國家視爲「勞動」與勞動者的保護人，要把它置於「階級」之上，但他最後倒並不像共產主義似的，把國家與社會等量齊觀。在共產主義的制度中，「集體」就是最高的中心，是理智的貯藏所與意識的泉源，它是超社會與超人格的；它所關懷的不是工人的利益，而是那使共產主義國家光榮的「集體」之力量及其發達。這是熱中於權力的結果，而對於權力的熱中，卻正是馬克思主義所念念不忘的。

對於這種思想，我們爲了生活中的某些高尚德行，爲了工作的權利以及由一己勞動所得的財產之享受權，爲了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權利，一定要引起一個反抗的運動。由於產業合理化的結果，特別如像北美合衆國的情形，社

會問題的主要點，是在於分配與消費的問題而不是生產問題。它顯然又是一個技術的問題，技術上的驚人成就（馬克思並未預見），恰恰使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現在成爲無效了。不過單靠技術與「合理化」也不能解決問題，因爲它們並沒有觸着社會問題的主要點，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們比其他任何東西更爲無用，因爲技術進步的本身，祇能使這問題的道德與精神方面，增加困難。

假使以爲祇當人的道德完善以後，就能期待社會的改進，那是極度地不忠實與錯誤的，我們一定要積極地爲社會的改造而工作。但當每次有人起來這樣工作的時候，無論他爲了保護工廠中的女工與童工，或爲要減少工作時間與工作的艱苦，或爲了訂定一個較爲公正的捐稅；統治階級的代表們就會出來抗議，說他侵犯了自由。這就是實際存在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實，它需要我們積極的關心與積極的參加；我們也必須參加進去，投票贊成這個或那個；我們再不能躲藏在中立的牆背後了。無論在社會與個人方面，我們的責任都要給飢者以食物。我們切不可忘記：如果我們不願麻煩，於是拒絕去

參加社會制度的改變，那我們就無異接受了一切因維持現狀而發生的惡行。資本制度的本身，是一種蒙着假面具的暴行，所以有人如果相信那保存現狀的人，實在是不應用暴力的，祇有那反對資本主義的人，才犯了擾亂顛覆之罪，這是一種狡猾的或糊塗的錯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財產即等於對他人的壓迫與剝奪他人的財產，因此，無論由國家或社會，對於由勞動所獲得的財產加以限制，我們就不能斷定它是一種暴行，而對於財產的保護，我們也不能隨便證明它是合法的。

自由與強迫，自由與暴力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加以考驗，因為對於它們，時常會發生錯誤與誤解。表面上的自由，很能隱藏着一種真正的強迫；表面上的強迫，也許會是真的自由。保護自由，即保護最後的道德價值，很容易變成一個簡單的保守原則，用以維持我們習慣了的強權的既存惡行；自由一義，時常被人們這樣地了解着與保護着，即欲使所有的改革與進步成爲不可能。一個在物質上居於特權地位的人，總把每一次更變和改善社會制度的改革，都目爲破壞其自由的暴行；倘因此而減少了他的收入，那他更要

用這樣的態度來看待改革了。當革命之時，他不僅把監禁，拒絕言論自由，槍殺等事看成為罪惡的暴行，而且連他以前所享受的法律上與經濟上利益之被剝奪，也目為不可恕的強暴。在另一方面，一個在物質上貧窮而墮落的人，就歡迎着社會的改造，將它看成為自己得救之道，而把那維持現狀的舉動，目為罪惡的暴行了，因為這現狀使他貧乏與不幸。

在某一意義上說來，一切變遷都是對物質世界的施用強力。當我站起來，走到另一房內去和某人說話的時候，就對我周圍的世界，繼續不斷地加以強力的改變：我把椅子推開，開門，叫鄰室的那個人轉過身來，聽着我。當我靜靜地停留在某一地方時，我的環境彷彿是自由的與非強制的。所以自由的意思，有時可以歸結在這樣的一個喟嘆裏：「呀，多麼的討厭喇！」

在社會的現實中，特別是在其物質的方面，自由與強迫這一問題的複雜性，甚至可以從這樣簡單的一個例子中判明出來。當一個人經歷了長期的奴隸狀態之後，他會把奴隸制度也看成為是經常的與不可變易的了，甚至會把它當作自由，一定要等他的意識中發生了一次改變，才會覺得它是一個不可忍

受的錯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任何事物都是變了形的，所以對於自主與強制的了解也是完全虛偽的，變更常態，被許多人稱爲「應用暴力」；由社會與國家採取適當的辦法來對付私人過多的財產，則被稱爲強暴的行爲；當環境的壓迫，使這些人做點工作時，他們又會以同樣的惡聲相報。他們從來不想，假如與生活負擔太重的人相比，這些「強制」簡直是十分公平與舒服的了。資產者沒有被槍殺，監禁或被妨礙其活動，如果抱怨說受到了暴力的壓迫，那是不對的。

當一個人被剝奪了基本的經濟權利，無法管理生產工具時，則不得不將自己的勞動作爲商品而出賣；這是一種強制，允許此種狀態存在的制度，是建立在專制主義的基礎上的。如果一個工人受到了虐待，如果他不得不忍受這種惡劣的情形，因爲不然的話，他就會遭到失業，而不能生活的痛苦，這樣，他的工作雖可稱爲自由的，因爲他能隨意離開它，可是有種可怕的壓力加在他的身上，他的自由祇是一個幻想。如果有一個人，依着他的權利可以自由去保持他的信仰，但因他的物質生活依賴着別人，這些人卻要他改革其

他的信仰，那這又是一種強制，因為人們懼怕飢餓之苦，所以能實行此種對自由的壓迫。輿論的統治，常能可怕地摧殘個人的天良，這統治甚至能墮落為十足的暴君制度。現代社會中的『自由思想家』，就是以這樣的迫害加於基督教之身。

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研究社會的改良，自由與強制這一個問題，是很複雜的，要解決這一問題，必先有很深刻的思想與考驗問題的最敏銳的了解力。基督教決不能同意俄國共產主義者所採取的暴力與強迫的形式，他們主張爲了要創造新的社會，可以應用暗殺，恐怖主義，剝奪人的基本自由，摧殘人的天良與心志等手段。但是，基督徒的良心可以，而且一定要准許某幾種的社會鎮壓方法，這幾種方法，一定要視爲替鄰人服務的工具，因爲沒有這種工具，則不僅真正的自由無法獲得，就是對於不幸者的物質幫助，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自由，其意義就是要在物質生活上，爲所有的人謀得經濟的保障；它假設着一個社會制度，其中無論何人，都不必靠着過度的勞動或墮落的工作來生活，也不必破壞自己的良心來求生存。

因此，我們切不可排斥階級鬥爭。問題的中心點，乃在於階級鬥爭必須加以精神化，我們必須將它附屬於精神的原則，使它脫離那復仇感情與殘忍的暴力之控制。

(註一)見歐皇庇佑十一世關於社會問題的通諭(又見里奧十三世的通諭，英譯者)。

(註二)這是誤解了天主教的教義。在某種條件之下，罷工權是被承認的。英譯者。

(註三)見其所著法國社會運動史。

第五章

貴族，資產者與工人

依照馬克思的意見，社會各階級是簡單與唯一地為經濟與經濟的生產所決定；因此，他就不去研究和解釋他們各種不同的心靈形態。事實上，他的心理學常是很粗疏的；他並不像評判者那樣地將他們加以評估。但是貴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各種不同的特性，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是具有很大的興趣的，因為他們代表着各種不同的精神種類，與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假使馬克思不浸潤於那種思想，即以爲經濟乃是一切真實體的決定原因，那他也許能夠看到貴族與資產者間的分別，比資產者與工人間的不同要無限地大些。前兩者屬於不同的種類，後兩者則屬於一種範疇，他們的分化祇由於同室操戈，貴族形態與勞動者形態，代表着獨立的價值；至於資產者形態則不管流行的見解如何，我總覺得它不能具有獨立的價值。

貴族形態不是由一時的經濟條件來決定的；經濟條件只是一個次要的因

素。貴族階級也許是很富裕，而它在過去也確曾是富裕的，但它的物質來源卻並不發生於經濟的企業與創業。他們的財物乃是由寶劍得來，然後則成爲時代的遺傳。它缺少一切經濟的特性，這些特性實在是爲資產者所專有的。貴族階級的本性，首先在於出身的高貴，在於其保守與精勤，在於「藍色血液」之遺傳性的轉注；它的地位並不爲經濟所決定，首先依賴於出身與祖先的美德。一個貴族不妨完全破產，他的家族可以在數世紀之中趨於衰落，因而失去了它的社會地位，就像俄國羅立克一支的某些親室一樣；但這現象祇具有次要的意義，因爲一切物質的財源雖然失去，可是家族的貴族性卻仍舊存在的。至於資產者則不然，他必須從事卑賤的工作以獲得其日常生活的麵包，倘若一旦失去了一切，那末他過去的社會地位，就不會再留一些兒影子的了。貴族雖在工廠中作工，仍舊不失爲一個貴族；他的手，他的臉，他的態度與聲音，都能表示出他的來歷；他的形容是幾世紀演進的結果，他的性格是代代相承地遺傳下來的。

貴族的經濟特權，並不像資產者的那樣，是由他個人的努力得來的。當

然，他的祖先惟以武力的劫掠爲務，因這是過去一般的風尚，但他卻已不能被詬爲貪財者了；他不能像人們所說的『得發』，不能使自己富裕，他的趨向祇在耗費他自己的財產。他保持着自己祖先們勇武的記憶，遺忘了他們那殘暴與乖戾的行爲；他所有的一切，無論他的產業及其精神的天賦，都是由祖先們承襲下來的，他是一個長期與緩慢的生長過程之結果。這過程存在得愈久，則貴族亦愈爲可靠。它利用着閒暇的可能性，俾得造成了高級的文化與生活上的精美習尚，使其他的階級企圖做倣；它的禮儀與『好的教養』，是具有有一種帶着普遍意義的文化價值的。它主要是自成種族的，這是它的長處，同時也是它的短處。貴族與資產者，在任何事物上都是完全相反的；前者記憶着過去，珍藏着前代的掌故；後者則對過去完全淡漠，除非有時對那較近的幾年發生一點興趣，它是祇在現時中討生活的。有些顯赫的資產階級家族，固然也常能表示出悠久的世系，且能以此自誇，但他們卻代表着資產階級中的一種特殊的貴族。講到真正的資產階級，那首先總是一些暴發戶，這也就是它那長處與短處的所在。

人們時常把許多特殊的心靈特徵，添附於理想貴族之身，這緣故就在於：貴族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勞而獲的，是遺傳的，而不是他自己努力與工作的結果。他不懂得憎恨，『暴怒』，妒忌；他也許會令人生怒，他時常這樣，但他自己卻不很容易生怒；因為發怒與妒忌不是貴族的感情，但如有人侮辱了他自己及其祖先的榮譽，那他就認為奇恥大辱，勃然而起，不惜流血以除去這一恥辱。貴族形態的價值，在於它是一種天賦；這正與人體的美一樣，是上天的恩賜而不能由人力強求的；假使一個人人生來就是美好的，那他當然用不着去妒忌別人了。貴族主要是由生理上與心靈上決定的，不是為經濟所決定，這一事實已經由經驗來證明過了；所以布爾雪維克黨人不僅反對經濟的特權，同時還反對貴族性的出身，高貴的祖先以及『藍色的血液』。貴族性的出身，最能引起他們的憎恨，即令那個貴族出身的人，因為經濟的境遇所迫，實際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了，但仍不免要受着他們的歧視。

貴族主義乃是富裕的產物，所以物質上的慷慨與豪爽，是真正貴族主義之不可或缺的特性。貴族不願意做商人，雅不願用勞動來積聚金錢。假使他

企圖致富，願意讓他的生活為經濟的計算所支配，那這祇表示了他願意『資產階級化』罷了。貴族主義總以為當我有生之初，就已擁有一些東西，並不是赤身入世，一無所有的；它是先天的而不是後天的。標準的貴族，身上積聚着歐洲社會早期武士所煅煉出來的高貴德性。這些武士的品性，雖當歷史上的武士制度逝去之後，仍舊存在着，成為人類中的一個永恆不變的成分。

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相反，是人類學上一種特別的人種。它肯定了不平等的原則。一個人可以成為資產者，但貴族卻必須是生成的，因為普通人無法變成貴族。『暴富』這種形態，完全與資產階級的精神相符，但是『暴貴』這種人，無論他們怎樣努力去掩蓋自己過去的遺跡，還是要使我們懷疑與難堪的；貴族階級的形成需要很長的時期，可是資產階級卻在一世紀之內就能形成了。真正的貴族階級是一種征服者與主人，他們與社會上的其他人等遠離，與其他人的出身完全不同。他們具有古遠的熱情；他們為要避免與羣衆發生不清白的關係，在自己的周圍築起了一座不通出入的籬笆；他們因為怕與羣衆相互混雜，有汙自己的身價，因而製定了許多習慣的法則，藉以保障

其生活上的排他性。這樣，天性上就發生了一種離羣索居的脾氣，外表上則發生了一種形態方面的質的淘汰。貴族的生活是孤立在自己的世界中的。

亞爾弗雷特·德·維尼 (Alfred de Vigny) 說得很對：貴族制度的基礎是驕傲，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妒忌；事實上，驕傲確乎彷彿是貴族制度的原始罪惡；這罪惡不是個人的，而是種族的與遺傳的，要克服這個罪惡（其中時常含有異教徒的成分），要使貴族轉變過來信奉基督教，特別困難，因為驕傲產生了對於其他階級的輕視，他們看不起那些身世平庸的普通人。貴族階級的孤立，它同過去之間的獨有的連帶，它之懼怕「混和」，它對於世事的淡漠，對於習慣的崇拜，這一切都使它走上衰頹與墮落的道路。就貴族這一名詞的社會意義來講，一切貴族的命運都是如此，它開始變成軟性了，完全沉醉於娛樂之中，逐漸失去了一切的精神。然後，它顯示出死亡的徵兆。它的威望與統治權，固然能在較長或較短的時期中存在，但它不能長期地反抗那生活的偉力，不能反抗那與其他階級的混和。貴族中的少數，表示出他有同化和適應於新社會環境中去的能力，但大半數都不能做到，他們貧困了，衰

落了。貴族中道德上最保守的人，帶着一種無可救藥的疲憊的樣子，彷彿已經失去了一切生命的狀態。

不過貴族的原素，始終成爲每一新社會制度的一個構成部分。貴族雖已失去了一切社會的意義，但它這還保持着一個心理學上與美學上的價值。譬如在法蘭西與美洲的民主共和國中，某一些有名位的與尊貴的家族，就是如此，他們在那裏所受到人們的尊敬，差不多比在帝俄時代的貴族還要大些。就社會方面來說，貴族是必須死亡的，再也不能復活了，但是就心理學上講，他將繼續存在，因爲其中有永久性的成分。當貴族失去了一切社會的特權，與物質的財富之後，我們最好來看重他那心靈財產的繼續，所謂貴族的心靈財產，並非指它的高蹈與驕傲，而是指它的文雅，高貴，大度，及其對於憎恨與瑣碎的超脫。它的歷史罪惡，在於它對中等階級的讓步，將自己適應於他們繼長增高的權力，而沒有贊助工人階級的事業。當然，這裏也有例外，最有名的就是英國，與貴族有聯繫的保守黨，願意同工黨聯盟，而大願意同中等階級的自由黨人勾結，因此，得能通過了許多社會改良的方案。

(註二)德國的情形也是如此。敵視資產階級之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的貴族社會主義，頗有成立的可能，但就社會方面說來，這主義並不能拯救貴族制度；它的社會使命已經完結了，它之反對產業化及其技術上的驚人成功，都是沒有力量的。將來的世界係屬於精神的與智慧的貴族，它是一個單獨的與特殊的現象，而不是過去任何歷史現象的回復。

此種貴族是一個社會的與心理的集團，決不能依照着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來決定的。它立於階級鬥爭之外，於階級鬥爭毫無關係，因為它除了自己之外，不復屬於其他的派別。有時，它的代表們，也許會與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發生關係，但它的基本旨趣卻不是經濟的；而是智慧的與創造的，它們與精神的價值有關，而不大具有物質的價值。因此，它的成員是由各階級中徵集來的，無論貴族，紳士，中等階級，農民或產業工人，都能成爲這一種貴族。在中世紀時代，這樣的精華，集中在宗教的場所，知識分子是屬於寺院中的，凡哲學家，學者，藝術家與著作家，都是僧侶，因為祇有居住在寺院之中，人們纔能逃避封建生活的粗野與不斷的戰爭。近代則一切都改變了，

宗教界的文化意義，在最好的地方，已經減弱了，最壞的情形則已經完全被忽視了；僧侶們在智慧方面，已經變得僵化與狹隘了。

精神的與智慧的貴族，並非由遺傳而得，也不是種族性的，而是個人的，它的價值，全靠每一個人所固有的性質，能力與創造力來構成。所以這是真正的而不是象徵的貴族。這一階級的品質，不是完全承受的，也不是完全獲得的，卻是又承受而又獲得的。假使社會的貴族無報價地由遺傳承受了它的價值，則精神的貴族，係上帝那裏承受了它的價值。上帝將創造性的天賦，即才能與天才，賜給了人，並不需要物質的報酬；但是上帝賜與天才，並不叫人包在手巾裏，藏在地底下，而是要叫人將它應用，發展，使其產生結果的；這就是說：人們必須將勞働的產品，加添到原有的天賦上去。凡是預言家，教會中的博士，宗教上與社會上的改革家，哲學家，學者，發明家，詩人，畫家，音樂家，這一切統統屬於精神的貴族。我們不能將他們配合到以經濟計算為基礎的任何階級體系中去。他們的生活完全貢獻於這種或那種的創造工作；但是他們的工作，在物質與經濟的意義上說，並不能生

產，他們的所作所爲，常能爲極少數人所賞識。這一貴族階級的人，因爲不會處理經濟的事情，所以時常陷於極貧乏的境地，而遭受到極大的苦難（工廠工人反而具有更強大的防禦手段）。他們首先被社會的貴族，然後又被資產階級所侮辱與迫害，現在他們在無產階級的手中，又冒着苦難的嚴重危險。

無論在心理的或社會的基礎上，精神的貴族都不能與資產階級相同化。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將所有的著作家，學者，等等，都加上一「知識分子」這一個空洞的名稱，歸入於資產階級；這一部分由於他們的無知，另一部分由於他們想取媚於工人之不良天性而進行的煽動。其實，我所說的精神的與智慧的貴族，與俄國人所了解的「知識分子」完全不符。假使因爲資產階級產生了許多天才，學者，哲學家，詩人，發明家與改革家，因而頌揚資產階級，那是太笨了。但如因爲這些偉人係從資產階級出身，因而排斥這些偉人，那同樣是太笨了。偉人們的社會出身，與他們的天才無關；關於這一點，當馬克思主義者講到馬克思與列寧的問題時，也是承認的，因爲這兩人都不能以無產階級的出身自詡。我們知道康德，黑格兒，歌德與席勒的出身是資產階

級，這與我們知道普希金與托爾斯泰之屬於貴族。一樣地無所驚奇。倘如馬克思主義者與經濟唯物論者的意見，資產階級既然產生了這麼多的創造天才，那應該為資產階級作辯護了。其實天才並不是任何階級的產物，而是由上帝創造的，即使那些反對上帝的天才如馬克思等人，也是如此。

使我們最感到興趣的事情，就是統觀人類的歷史，只有極有限的人過着精神的與智慧的生活，他們獻身於思索與創造，把這兩者作為自立的價值；同時我們又看到，祇有極少極少的人，在他們對於人生之意義及其變化之探求中，能創造出新的價值。人，大概可以分成為能創造與不能創造的兩種，原來人就是上帝的作品，所以就其本性來說，每一個人都是能創造的，雖然有些人祇能和別人發生聯繫才能創造。但是各階級中的最大多數，總願意讓他們的創造能力消滅，而只為了日常生活中之世俗的，經濟的與商業的利益而生活着，他們看不到另一個世界與較好的生活。假使你能在大街上，在公共場所，或在他們的家裏，聽一聽普通男女們的談話吧，那你真會被他們的庸俗所驚嚇，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這些平常的小事，他們顯然不能超出於這些討

廉的瑣事之上。每一個階級都沉溺於「日常生活」中而不能自拔，它們祇靠那卑屑的法律與規則來維繫着。一般的人，祇能藉宗教生活來提高其精神；宗教是他們唯一的精神糧食；但有時宗教還不能提高他們的精神，卻反而降低了去遷就他們的程度。總之，真正能對精神的事物發生興趣的，還是極少數人罷了。

這是人類中的基本裂痕，比任何劃分階級的裂痕要深刻到無限倍的。

現在我們要把貴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聯合在一起，祇就意識方面來加以估計，在這一方面，他們相互間的不同祇是在態度，習慣，言語，風度以及他們之所有物上。貴族之能從事於創造工作；生活於精神的與智慧的最高利益中，總不能爲人所諒；他們總被視爲異己的族類。一般地說，所有的階級都對精神的智慧的貴族採取一致敵視的態度，各階級都希望他們爲自己的利益服務，倘然一遇反抗，那就馬上上去迫害他們，但這裏又有困難與矛盾的地方，因爲這貴族的本身，就具有一種腐敗與衰落的傾向，它漸漸地變成爲自限與無能了。上帝把精神的與智慧的特出天賦，賜給於人，其目的在使

人能將它應用於創造的方面，俾得完成其所託付的使命。能創造的天才，從上帝那裏接受了天賦；一定要注意那內心的呼聲，這聲音在號召他爲上帝及人的聖像服務；這就是說：不要爲普通的社會或階級利益服務，而要爲真善，美服務。現在的精神貴族，也許能爲這呼聲所震盪，開始像社會的貴族一樣，在驕傲的孤立狀態中，祇顧到自己了；它能從一般的社會中分離出來，造成一個排他的獨立的精華，卑視它周圍的環境，在自己的優越狀態中消遣。不過這樣一來，它卻已經叛變了自己的事業，走到頹唐與死亡的路上去了。還有更壞的，就是這種頹唐與死亡，他們竟誤以爲是較高境界的象徵，這是孤立的與無用的驕傲！

精神的貴族，必須履行一個預言家的使命。所謂預言家這一個名詞，在此地是就其廣義而言的，即是說：要幫助大家造成一個較好的前途，要保持新生活的精神，要創造新的價值。這種精神在哲學家，詩人，藝術家，改良家，發明家，以及在更嚴格意義的宗教預言家的身上生息着；當此種精神開始衰頹，高尚專業的意識開始減弱的時候，貴族就墮落了，失去了它存在的

理由·喀來爾 (Carlyle) 在其所著過去與現在一書中所說及的勞勸新貴族，其意顯然是指那從事於預言事業與企圖改變人生的那種貴族，而不是指那由孤立的愛美者所組成的虛妄的「選民」；這些愛美者從來只曉得消費而不能生產。盪漾在歐洲知識分子「選民」們頭上的那個死亡的精神，只證明了社會的危機，它震撼目前社會的文化，使它發生了痙攣，但是精神的與智慧的貴族，乃是人類社會中一個永不可缺的原素，沒有了它，社會將無法存在，這是建立在階級鬥爭中的一個教權等級政治的原理，因為在每一真正的教權政治中，各個等級都是相互依存與相互連結着的。所以技術家的工作，是依賴着哲學家與其他科學家的工作的，雖然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不大容易覺察到。

「資產階級主義」(Bourgeoisism) 這一個名詞的概念，同貴族主義的概念一樣，能從社會與精神這兩方面來加以解釋。但是精神的貴族主義這一個名詞，表示着價值的積極增加，而精神的資產階級主義，卻只有一個消極的資格；因為資產階級主要是由經濟來決定的，「經濟人」恰恰就是資產階級的

人。經濟乃是資產者之物質的占有品及其自身的創造；資產者雖然完全不知道馬克思的學說，但他是一個經濟的唯物論者。他對於經濟的態度，與貴族的態度完全不同，貴族並不希望自己發財，在他看來，經濟發展的範疇是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則相反，他要自己的努力，創業與精力來致富。就經濟上說，他是從深淵爬到了頂巔。所以發現進化之理的，也就是他。無限制的擴張，在他覺得是自然之理。貴族所見到的是「起源」，而資產階級所注意的是「結果」。前者不能再向上升，他只能下沉或保持原來的水平。後者卻是「向上的」，他開闢自己的道路，因而吹噓着他是自創基業的人。這兩種人，都會征服過世界。不過在以前，武士們是以槍劍來征服世界的，而現在的事業家則以經濟的，工業的與財政的活動來爭取天下。

資產者是一種辛勤的人，他不懂得閒暇，而貴族的長處，卻正在於利用這種閒暇。資產者的生活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他的事業。即令他是一位百萬富翁，也還是那樣專心於業務，像貴族們所享受的閒情逸致（歷史上僅有的二種），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資產者永無休止的時候，他時常做了自

己事業的犧牲者，假使他過着奢侈的生活，那末也是爲了他工作上的需要。貴族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由於自己的機巧，用心，冒險與精明，是可以發財的；資產者卻時時刻刻地記着：必須要這樣幹，纔能發財。一個資產者假使過着寄生的生活，及『享受着生活的快樂』，那他已經墮落了，已經從他的同伴中分開了。在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中，倒也有一些刻苦禁慾的成分，他的勞働，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要倍增其經濟的商品與價值。（註三）他提倡着要發展人們的經濟能力，而這也正是他對於世界所負的使命。他被一種劫掠的熱情所迷執，一心要去發現新世界，要無限制地擴張與發展，這樣一來，他成爲勸力性的了，再不能生活在一個靜止的與靜力的宇宙中。經濟生活乃是他高尚的 (par excellence) 範圍，他要在那裏發生不斷的變動；他不能忍受情性與停滯。魯濱孫·克羅梭就是資產者在其首善時期的代表形態。

資產階級中又劃分着許多的『階層』，每一階層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心理性質。一方面是古老的與自尊的資產階級，他們屬於現代的初期，他們遵守着自己的傳統；他們有自己的道德，帶着一種特別貴族的品性，他們像古時

一樣地勞動，滿足於適量的財富；另一方面是新的資產階級，他們用不着什麼傳統，他們的生活只是一種永遠狂熱的冒險，他們永遠追求着利潤與致富的新法，他那不能控制的推動力，不停不息地在使經濟向前發展，因而產生了現代資本主義之空幻與荒唐的世界。這一新的資產階級過着縱慾與無限制的奢侈生活，已經發生了解體與衰敗的原素，它妨礙了更向前進的創造。他內心中要求行動的呼號，也許還能聽到，他也許還有一點勇敢與力量，但是已經沒有效果了。因為新的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不能避免地要崩壞，他已經失去了對於理想的興味，他的使命彷彿已經完結了。

他們所要討論的根本問題，就是：資產階級對於工人的態度是怎樣的？工人的價值，與他勞動的價值相符；而勞動卻是神聖的。聖經對於我們這個罪惡的世界判定了罪狀：「你必汗流滿面纔得餬口」。對於這個判詞，一切人中，彷彿祇有勞動者是最服從了的。他擔負起我們生活的重負。他心中鬱積着「對於世界的憂慮」，這種憂慮，據海特權 (Hölderlin) 說，乃是生命的本質。勞動者只知道生命的開端，而不曉得它的繼續發展，因為他那短促的

生命，比任何人更在悲慘與罪惡的世界中度過的，它被艱難的貧困所束縛着，其中祇不過很少數人，才能達到比較自由的環境，且能有大量創造的空間。至於大多數人在不斷的勞動中憂傷疲憊，而這幾個人爲什麼能得惠獨厚，我們也是很難知道的。要懂得這個緣故，祇當我們超出了世俗生活的範圍之外，才有可能。不過有一點是爲我們所確知的，即：人類一定不能平等。假使在某種情形之下，人們達到了自由與豐富生活的共同標準，那末人類的一般進步就不可能了，所以質量上的淘汰，也是人世間所不可缺的。貴族們首先用暴力建立起社會的不平等，他們首先把自己從勞動與經濟的煩惱中解放出來。這樣的貴族，在早期歷史的蒙昧時代就已經有了。資產者的出身，同工人一樣，是一個苦惱的勞動者，不過他的勞動種類不同罷了。他那成功的唯一來源，就是他勞動的價值，艱苦的辛勤以及他用心的設施；至於資本的本身，那是不能產生資產者的。當資產者在初期發跡，以及改善其地位的時候，那種情形，與其說是一個特殊階級的進化，毋寧說是由於他們個人品質關係而形成的個人的成功。資產者的品質（他本身具有的，而不是他

身外占有的)，完全由他的勞働來決定。因此，他彷彿仍然屬於勞働者之羣。他是工人的嫡堂兄弟，每一個工人都能成爲資產者。實際上，資產者不過是『得發了』的工人罷了。這情形在北美合衆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裏的資產階級是最沒有傳統性的。但是爲什麼在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有這樣可怕的敵意？爲什麼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鬥爭中，是兩個主要的衝突者呢？

資產者從勞働者的隊伍中出來，因爲他很快地表示出極大的冒險性與力量，所以就叛變了其他的勞働者。這原來是勢所必然的，因爲中世紀的人總不能永遠存在。新世界出現了，其中感覺到一種想統治世界的野慾；浮士德博士起來了，他的主張在資產階級中顯示了出來。這些資產者再不願成爲勞働階級中的一個構成部分了，甚至於不願做他們的領袖與先鋒了。他們開始爲自己的出身而臉紅，他們也來穿大禮服，戴高頂帽；建築奢侈的旅館，別墅與菜館了；他們組織成了新的階級，敵對着勞働羣衆；他們爲了剝削的目的，又組織起一個僱傭的壓迫制度。這在道德上是一齣悲劇，它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變成極度的兇惡與可怕了。

有一種學說，以為資產階級乃是天賦最高的工人們在質量上淘汰的結果；至於整個勞動階級之仍處於卑賤的地位，則因為他們自己的無能。這種學說，不僅虛偽，而且是無恥的。實際上，資產者中有許多無才無能的低級人占據着重要的與負責的地位，而工人中卻也有品格很高與極有天才的人。只有天才（這是上帝的賜與），或者極特出的才能，纔能在一切艱難與阻礙中開闢出道路來。但是天才可不是資產階級的。

資產者不把他的勞動視為人類服務的一部分，他從來就是人類社會「原子化」的主要主張者；他確立了經濟競爭的原理與事實，發揮其無情的自私，把所有的金錢寄託在強方之上。他把物質的經濟財源的發展，置於人及人的靈魂之上。

有一點很使我們感到興趣，須得將它指示出來的，就是馬克思一方面把資產階級加以榮譽化與理想化，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憎恨着它。這正因為他的學說使然，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馬克思以為資產階級會履行了發展物質生產力的偉大使命，因而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因此，他暗底裏贊成資產階

級之叛變勞動羣衆，因爲這樣的叛變，準備了無產階級的形成。但就歷史來說，資產階級的活動，累積了惡感與明顯的敵意。他們所造成的勞動條件，比農奴的情形更不合乎人道。這在基督徒的良心中，是不能認爲正當的。經濟的浮動與不安，日常生活之全無擔保，在資本主義之下，已經達到了最大的限度了。這普遍的紛擾，使人們備受痛苦。陷入瘋狂的混沌中去。人們從自然力的貧乏中解放出來，卻不得不倒入金錢的虛幻統治權之下，在這樣的統治中，人們是認識不到真實的。不過資產者與工人之間的衝突，現在已經達到了空前的激烈狀態了，由此就發生了資產者精神這一個問題，這精神是一種完全特殊的現象，它必須與社會的「資產階級主義」區別出來，它與階級並沒有任何關係。

這精神的本身，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無關，它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很久就存在了），只是被資本主義加強了與鞏固了它的力量，無論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者，都很容易受着它的傳染。它產生了唯物論，「經濟主義」，對於物質成功的崇

拜，以及對於精神世界與未來生命的否認。一切事物都被固定的範圍所囚禁着；無靈性被封鎖在靈魂中了。總之，人們靈魂的本身，已經被變成爲資產者的了。

來翁勃勞易在其所著極尖刻的書：平凡的解釋中，很生動地指示出這個資產者的精神。他是一個天主教徒，與法蘭西的象徵派同代，他既不了解社會主義，又不知道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的學說；但他之斥責資本主義與財神的統治爲對於基督的叛變（他常時以「窮人」來稱呼基督），卻是最有力量的。他保護那窮困與受難的事業，頌讚它們，並且揭穿金錢的神祕；這金錢用了十字架的刑罰來把「窮人」和世俗的財富分開。在勃勞易看來，資產者祇相信那可以目見的东西，他們把永恆交給了時間，破壞了天上的樂園。他確信着與「資產階級主義」正相反對的，是基督教而不是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雖然，很不幸的，我們時時可以看到有什麼資產階級的基督教，與資產階級的天主教之存在，但他對這些東西的憎恨，比對任何事物爲甚。他觀察到主上帝祇是資產者商店中的一件裝飾品，頗爲痛苦。

勃勞易與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分類法之間，絕無關係；他也許會在共產主義者的隊伍中，發見許多具有資產者智慧的模型，因為共產主義者只是完成了的資產者，他已經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已經成為囊括全世界的集體人了。祇當革命的熱情持續時，在那進行虛無主義的與魔鬼似的破壞工作之短時期中，社會主義纔能從資產者的精神中解脫出來。共產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理想人，與資產者的理想人無異，同樣是那個「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也者，那是沒有靈魂與人格，而祇關心於生活之技術組織的。結果則因社會主義沒有精神的基礎，也就沒有關於人格的理想，因為「同志」這一個理想，決不能與「人」的理想相符。社會主義所關心的只是那存在於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其目的只要建設一個衛生工廠的可憐的樂園；這主要是資產者的理想。

我已經摘引過來勃勞易的著作；但在十九世紀（即在資本主義的世紀）中，除了他之外，還有許多天才的思想家與著作家，他們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精神，並且進行有力的攻擊，但他們並不是無產者，也不是任何社會

主義運動的擁護者。我祇叫提到下列這幾個名字就夠了：湯麥斯·駱萊爾，開爾克加特（Kierkegaard），易卜生，尼采，在俄國則有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費道洛夫，及反動的來奧地也夫（Leoniev）。此種對於「資產階級主義」的仇視，是由漫浪派所造成的；還有象徵主義，它的意義在於對資產者精神的拒絕接受，它沒有攻擊這個精神，只是把它擱開了不提。所有這些精神的現象，都是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發生的，這卻證明了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是精神的而又是社會的。實際上，要克服「資產階級主義」，不僅是一個社會的任務，而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最嚴重的精神鬥爭的前夜，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了解這一點，他們繼續在經濟的與「階級的」戰場上作戰，殊不知他們已經在敵人的前面投降了。精神排斥了「資產階級主義」，故孔否認精神者，都相當表示出資產者的心智。「資產階級主義」和真正的與完美的基督教，即十字架的宗教，站在正相反的兩個極端上。這主義乃是十字架與人生中悲劇原理的否定。被無恥的煽動所敗壞，且被一切罪惡的觀念除去了靈魂的工人，一旦成功，很容易成爲資產者與剝削者；當他做了主

人的時候，他可以迫害其無產者同伴中的知識分子，及消滅一切精神的貴族。

從這些結論中，我們可以確定基督徒對於世界上所進行着的社會運動的估計，以及基督教對於階級鬥爭的態度。基督徒的意識，植根於精神的世界中；故不能被此種鬥爭所決定，它必須超于鬥爭之上；因此，也只有它，纔能評判這一鬥爭。基督教並不從物質的經濟生活中，得出它關於道德價值的評判；而是從更深刻的泉源，即從精神生活及較高世界的啓示中，得出來的。階級鬥爭是存在的，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個真理；即令他是一個部分的真理，是屬於鬥爭者之某一方面或兩方面的真理，我們都無法否認。我們以為在工人方面有更多的真理。不過在我們看來，各黨派的精神狀態，較之於他們的經濟地位，更為重要。我們的任務，不僅要克服人與人之間的資產者的關係；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達到其最後形態的那種關係，同時還要克服資產者對於人生的態度。現在假使要克服這個靈魂上的「資產階級主義」，最要的就是要接受十字架的神祕。

社會問題，不能與精神問題分開來解決。假使人們的靈魂，首先是工人的靈魂，沒有經過基督教的更生，那末社會主義的統治，將一定成爲資產者精神的統治了；即但求現世的滿足，否認永久的幸福。我們只有去尋求上帝的天國，才能走向勝利。要使社會貴族化，這就是說：要使精神貴族充塞到全社會中，至少應該以同樣程度進行社會的民主化。新社會將是工人的社會，但他必須有一個貴族的原理，新社會決不可依照着機械的世界觀，排斥一切宗教政治的等級，它應該依照着人們的性質，才能與職業，實行真正人類等級性的宗教政治。我們一定要超出在階級之上，使他們停止鬥爭；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依照不同的才能來分配工作，更不是要確立一個關於機械的統一之反宗教等級政治的原理。實際上，共產主義者很顯然的承認着這一層道理；但他們在原則上，不願承認精神文化中的貴族原素。他們爲外界的必然性所迫，準備承認政治的與經濟的不平等；但他們却免強地要壓低精神的文化，使其趨於一致，就是要使質量從屬於數量。

不過這貴族原理假使逸出了宗教的範圍，則其矛盾就無法控制了。只有

基督教才能指示出超脫困難的道路；因為他承認一種精神的貴族，即上帝兒女們的貴族，他與人們的社會地位無關，建立在特權基礎上的貴族，發源於希臘羅馬，即其來源是異教徒的，與基督教無關，故有成爲無用與野蠻的危險。基督徒靈魂的狀態，被犯罪的意識所決定，而不是爲受難的意識所決定。罪惡之應受譴責，這意識就精神方面來講，是比那受難的感覺更爲高尚與貴族的。只有基督教才來醫治人類靈魂中卑鄙的猜忌。人們的嫉妒與惡感，都是因猜忌心而發生的。如今看到了人類文化那種無可挽救的衰落，看到了人類文化之被簡單的數量所統治，真叫人難過到了極點。我們這時代中不可避免的轉變過程，繼續不斷的給文化以打擊，最後它甚至有完全被消滅的危險，要控制這個過程，只有依靠着宗教，依靠着人們全體的精神努力。

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必須了解的，就是基督教並不，也不能從進化的觀點來觀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基督徒不能信從十九世紀末葉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說，以爲資本主義，一方面是必須反對的一種罪惡，另一方面又是必須加以獎勵的事物，因爲資本主義的擴展，將使階級間的鴻溝愈加寬大，

使生產力發展，且能引起無產階級之更大的仇恨。這樣的相對論法，只能產生無法解決的道德上的矛盾。人們當然可以相信工業與經濟的進步，是一件好的與有價值的事，因此贊成這種發展。就像目前俄國共產主義之犧牲資本主義以加速工業化一樣（共產主義駁斥資本主義，然共產主義的本身也該受道德上的譴責）。但我對於我自己信以為惡毒的與不義的事，當然也可以不加贊成。資本主義能使物質發達，所以無論在今天或昨日，我都能肯定它這一個因素之積極的價值；但如資本主義在過去有一種主要的罪過，那末在將來它也還是難免，所以我必須反對它。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那種相對的論法，我不能片刻勸人去加以同意，因為「善」祇能從「善」中產生，而決定不能從「惡」中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的惡毒與罪過，決不會因它的發展或因它所賜與的利益而稍減；基督教祇能根據着永恆的事物，根據着社會之精神的與道德的基本原則，來評判資本主義之精神的與道德的缺點。馬克思主義以為人們的靈魂與身體，可以為經濟的繁榮而犧牲；基督教則決不允許有這樣的事情。

假使以爲經濟的發展，祇能依據於非道德的原則纔有可能，那是沒有理由的；此種非道德的原則顛覆了生命的基礎，放縱了貪婪的自私與其他罪惡情感；基督徒對於這些情感，祇能設法遠避與表示懺悔；其實，要謀得經濟的發展，除了不法的競爭之外，還有其他的基礎可資憑藉，這就是費道洛夫 (N. F. Fedorov) 所了解的『行動的公社』。(註三)

(註一) 在這裏，且允許我這個英國人，作一個懷疑的附註。貝蒂也夫先生這一個樸實的說明是太簡單了；他彷彿沒有估量到我們這許多『愛族們』之政治陰謀的結果以及他們的本性呢。——英譯者。

(註二) 麥克新威談到『內心的禁慾者』，說到那些資本主義創造者的特性，並且在喀爾文教派中追溯他們宗教的來源。(在英文中，R. H. L'Amney, George O'Brien 教授，D. S. P. Haynes 等人，也曾發揮過同樣的意思。參觀最近出版，John F. Dyna 所著的洛克斐爾傳，該書題名為上帝的黃金，頗具深意。——英譯者。)

(註三) 以費道洛夫的著名共同勞動的哲學。其意為聯合一切人類的力量——科學的，經濟的，社會的，國家的與國際的從事一宗偉大的工作，即：戰勝自然，擊敗死亡。——英譯者。

第 六 章

教會與新社會的實際——人與階級——社會問題是一個精神的問題

我們這些議論的整個旨趣，可以歸結成這樣的一個結論：對於階級鬥爭這一回事，基督教不能不做一個實際的評判；基督徒不能以這樣的一種說法自滿，以為從我們的祖先一直到現在，一向就太平無事，對於新社會實際情形的存在，假作不知。事實上，如果我們談到目前的社會與文化的進程，基督徒的意識確乎是落在時代之後的，這也是現代基督教墮落及其缺乏創造事業的一個證據。就歷史的與外界的情形來說，教會對於世界上所發生的驚人的變化，似乎不很關心；它彷彿沒有注意到：它所見到的教長政治的情形，已經不復存在了，而現在所行動着的卻是一種全新的社會關係。不過它現在對於那新社會的實際，業已不得不決定其態度了。對於那相互衝突着的兩方面，它遲早要從自己意識的底裏，發出其贊否的主張，並確實地參加一方面

(註 1)。

聖約翰克立索斯頓 (St. John Chrysostom) 的教義，與現代社會的實際相符，乃是共產主義的一種，而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情形決無類似之處。教會的訓誡教我們用憐憫與施捨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雖然那些硬心腸的人，有時也會被它們所感動；但在現代，它們卻太不合乎實際的事實了，它們太不適應那為社會正義而進行的運動之需要了。它們是過去時代的呼聲，這一時代已經死亡了，消逝了。尤其是俄國正教的那種社會思想與說法，完全適合於過去社會的組織；見了這樣的教會，人們一定會這樣想：彷彿我們現在仍舊生活在貴族，農民，商人與小資產階級的世界中，不僅無產階級的革命似乎還沒有發生，甚至連資產階級革命都彷彿不會有過呢。教會固然要注視着永恆，但她同時卻必須在時間中生活，它必須要說一種社會的言語，能適合於它向之發言的世界。在過去幾世紀的情形如此，但在現在，它的言語已經古奧了，它所能適用的那種社會情形，現在祇留贖着少許遺跡了。教會的社會基礎業已改變，新社會的組織成分，必須是大多數工人與少數的知識分子；再沒有貴族，也再沒有商人階級的了。未來的社會將是勞動者的社會，

教會要能適應着它，像它在過去適應其他的社會一樣，同時它仍舊要成爲永久真理的保護者，因爲這是教會對於人類靈魂的貢獻。

有些人說：教會經常祇能在君主專制的與分成階層的族長社會中存在，故對於那推翻等級與階級的勞動社會，教會應該迴避，應該拒絕它祝福，且應托庇於原野之中；這是一種古怪的說法，完全與基督教的精神相反，而是爲反動派所信守着的。實際上，在此時基督教會應該特別爲工人操心，因爲工人們爭得了社會制度之後，他們的精神上將蒙受着極大的危險，將被無神論的毒藥所害了。真正的基督教會，從不會被世俗的利益所敗壞，它一點也不知道階級。誰假使到教會中去尋求精神的糧食與永久的生命，那牠已經不是貴族或平民，資產者或無產者了，一切飄忽的名譽與虛榮，都丟棄不顧了，因爲在上帝的眼中看來，等級或階級的屬性，都沒有任何價值。假使正教對於國家與地方的權貴者曾經獻過特殊的殷勤；而教會的長老在塵世的大人物之前，表示過道德上的缺陷，那末這不是上帝的教會而是凱撒的教會；這是教會繳付給凡俗世界的一種貢稅，是對於「時代精神」的一種迷惑。教

會在其意識的深處，從來是超階級與排斥階級的，就是在目前，祇要談到教會的意識，也還是沒有什麼階級這種東西。假使我們高超於那使世界苦惱的階級仇恨之上，那我們在精神上與道德上，也就超出於階級的本身，及形成階級的精神之上了。馬克思對於這樣的一種精神勝利，完全不知；他承認特權的階級，在人類中宣傳階級的態度，且歡迎由此而生的憤怒與仇恨。

當我們說要超出於階級仇恨之上的時候，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教會應該贊成階級的調和，使被壓迫與剝削的人們完全屈服。這將是一種最徹底的偽善，使教會永遠戴上資產階級的標記。戰爭並不簡單是一個罪惡，有時也許是一種善行，爲了人之適當的尊嚴，有時也須要戰爭。當剝削者，顯然需要宣傳屈服的時候，我們假使又來對被剝削者宣傳這種東西，那是完全錯誤的。況且屈服並不是一個社會的行爲，而是私人的與精神的行爲。教會的責任，首先應該站在道德的與精神的立場上，而不應用某種社會制度的名義，去譴責人對人的剝削與壓迫。它必須祝福那些尋求更公正與更合人道的制度的人們，且囑咐他們用自己的膽量，活動與自由，去爭取較好的前途。社會鬥

爭是不可避免的，無論發生了什麼別的事情，它還是會發生的。基督教的任務不在於解決這一鬥爭的技術與方法，而在於爲那些參加鬥爭的人們造成精神的與道德的空氣；這些人同時又反對那產生極度仇恨的那種罪惡。甘地不是一個基督徒，但他的消極抵抗，他的『不進攻的戰爭』，比那所謂基督教社會中所常用的方法，卻更加合乎基督教的精神。

基督教的意識，首先一定要將它對於個人的態度，和它對於階級的態度，作一個極明顯的劃分。因爲前者是較爲深刻的，首要的與關乎永恆的；而後者則是次要的與暫時的，永恆生命的承繼者是人，而不是階級。階級是『遼遠的東西』，人卻是我們的近鄰。一切階級在死與永恆之前完全消逝了，祇有人還存在。這一真理，無論『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都必須知道的。我們的基本任務，乃是『關於人及階級』的任務。假使基督教在社會鬥爭中參加在勞働階級的一方面，那它並不是爲了階級的名義才去參加的；而是爲了人，爲了勞働者的尊嚴，爲了他的人權及其被資本主義所悲慘地磨折着的靈魂。這和唯物論的社會主義之間，有着很大的區別；如基督教的運

動中含有某些社會主義的成分，那這成分一定是『人格主義的』，因為基督教傾向於個人化而不傾向於集體化。創造資本主義的機器，使任何事物都變成集體的與非人格的了；但是技術之更向前進，也許能給我們造出一些新機器來，它將推動人類走上另一個相反的過程，到那時，這成爲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共同屬性的『非人格主義』，也許會消失了。蒲魯東也許還能戰勝馬克思。不過基督教也不簡單地要求個人化，它同時要求個人主義的勝利，應該爲了人們的親善。

直至今今，基督教在階級鬥爭這一破壞性的事實之前，總是陷於一籌莫展的地位，因爲它在過去並沒有適當對付的經驗，它的任務確乎顯示出極複雜的兩重性來。教會的責任一方面固然要決定真理之屬於何方；但是更重要的，它應該知道怎樣去消除那真理保持者所浸沉着的仇恨的感情。教會能祝福那些反對資產階級專制及其剝削的鬥爭，但它不能爲工人階級及其全體成員的仇恨祝福。因爲這種敵意，乃是唯物論社會主義道德的一個構成部分，而且還是共產主義的一個必要原素。在共產主義之下，人完全被階級所併

吞。馬克思稱之爲救世階級的工人，如何能從這些惡的情感之中救拔出來呢？

關於基督教道德——愛，屈服，慈悲——之普通的宣傳法，都是沒有結果的。這種宣傳，常時甚至被人斥爲刻板的辭令，斥爲偽善以及使敵人軟弱與解除其武裝的一種遮掩的企圖。不過共產主義的宣傳，確乎也很快地成爲叫人討厭的一種老生常談了，其中滿是些煽動性的刻板辭令。所以現在有一個巨大的責任，落在我們基督徒的肩上了。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一種新鮮的，年壯力強的與具有創造力的言辭。可是我們現在還不會發見它。在這個罪過的社會空氣裏，假使仍舊照往常一樣宣傳那勸人屈服的教訓，這是不對的。工人們的靈魂，已經被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毒藥所害，很難使它來了解基督教的真理。如果要它能了解基督教的真理，那必須叫工人們知道：基督教是與社會的真理有關，與社會的虛偽無涉。換句話說：基督徒應該站立在勞動與工人的一方面。

基督教對於它社會責任的重新估計，我們已經在年青一代的歐洲人中看

到它的表現了，無論天主教或新教的青年，都接受着這個新的估計，其中最好與最有知識的人，已經堅決地在反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精神了。這是個令人鼓舞的徵兆。這一些思想，在年青的俄國東正教徒中，還很薄弱，他們不了解社會問題的宗教意義，而且還沒有去掉他們因共產主義而起的消極的反動。但當歐洲一部分的青年被這問題所引誘，且以宗教的態度去考慮這一問題的時候，另外一部分青年卻把他們的熱情傾注在國家的與種族的問題上去了。例如年青的法西斯蒂與德國的國社黨員。世界被兩個同樣可怕的問題所分裂了，即階級之間與國家之間的衝突。他們都要危害到全體人類的統一。

馬克思被他一元的經濟方法所誤，不能正確地了解國家的與種族的鬥爭之意義。在他看來，這些鬥爭完全須視經濟的過程來決定，雖然國家的成分，實際上確乎有真正的與反的很大意義。不過社會主義及其階級鬥爭注視着未來，而國家主義對於現在雖然還能起一點作用，但終不過是過去的一個遺業罷了。國家主義祇有在東方民族中，還有前進的作用，東方民族的國家

主義也似西歐的資本主義一樣，仍有其社會的真實意義。一般地說來，國家主義之繁殖仇恨與敵意，正與階級鬥爭相同，它除開了這種憤怒的鬥爭，那就無法前進了。至於種族主義，則不論它的原因如何，總顯然是一個反基督教的现象；雖然它有時也採取宗教的形式，但這祇能算是異教主義的一時暴發；法西斯蒂與希特勒的黨人們都是異教徒，是基督的敵人。講到從正教的教義中所引伸出來的國家主義——這是很久以前爲人所抱怨的——那也是異教的，這是對於基督教與正教的曲解。

基督教之斥責國家主義與特殊主義(Patriotism)並不是要否認國民性，否認國家的感情及其成就，否認對於某一民族的愛，也不是要代之以抽象的國際主義或排斥愛國主義。不過我們這時代中基督教的與人類的偉大使命，在於謀得一切民族的聯合與調和，並不是要做到國際的與抽象的統一，而是要做到超國家的具體的人類統一。國家主義的與特殊主義的運動，乃是解決社會問題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巨大障礙；他們增加了世界上敵意的比重，其結果則與唯物論的共產主義一樣地仇視精神，陷於原始的與粗野的自然主義

中。不過這問題在本書中是偶然提及的。此地我不能加以適當的分析。我想說的祇有一點。即階級鬥爭的問題是與軍事的戰爭問題有密切的聯繫，這戰爭卻是威脅我們的一個最可怕的危險。我們很有理由來贊成那種說法，即：國家之間的每一次民族戰爭都將變或階級之間的社會戰爭。（註二）這將是資本主義之流血的與可悲的結局，在這結局中，所有的國家都要失敗；到那時，我們多半能夠聽到歐洲文化的喪鐘了。

國家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的黨徒們，很狡猾地罵工人們自私，說他們把自己的階級利益，置於民族的與國家的利益之上。可是在內心及道德方面來說，情形並不如此。工人們之懷疑財政的與國際的（被稱為國民的）政策是應該的，他們假借了國家的名義，號召工人去犧牲性命，而暗中則銀行家大發其財；這樣的事情，不可否認是常常有的。工會自有其反對賦稅政策的權利，且能反對增加失業的產業「合理化」，以及反對那由財政利益之瘋狂衝突而產生的戰爭。假使工人已經有了力量，能夠拒絕去參加世界範圍內的戰爭，那他們對於人類以及每一個國家的利益，都將有莫大的貢獻；但這行為

定全不等於否認那真正的與合法的國家與國民利益之存在。

基督教決不贊成取消人們個人的良心，理智與自由；也不贊成以階級的良心，理智與自由來代替它們；基督教所知道的是普遍的理智而不是階級的理智。我一定要再重說一遍：人比之於種族或階級，是一種更深與更高的真實體，我們必須拿這一真理去反對一切階級及其一切利益與仇恨。

在十九世紀中，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們，渴求着正義，他們企圖把資產者的統治階級加以精神化與高貴化，勸他們要公正與犧牲。他們以為向統治者宣講一種道德的真理也許是有效的；因此他們就說：工人也是人，即使比較低階級中的入，但他們的尊嚴也必須加以尊敬，過去關於奴隸與農奴，人們也曾這樣來教訓過他們的主人了。不過現在，舊式的道德勸說再也不能與實際情形相符了。它們已經過時，以後就不夠用了，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要使資產階級（它的道德意義早已完全失去了），而是要使勞動階級精神化與高貴化，因為這一階級的社會重要性及其權力正在日漸增長，將來還會有更大的力量。現在去要求資產階級犧牲，顯然已經太遲了；現在

的問題就是要對工人說：資產者與紳士們也同樣是人，所以你們必須適當地待遇他們，要尊重他們的尊嚴與價值。這一點，至少在蘇俄應該這樣做了，將來在西歐也許都會如此。

人對人的態度，如果祇簡單地看成爲這一或那一階級的代表；那我們一定要在上帝與人的面前加以否認。例如，普蔭凱雷君的政策是保護資本家利益的資產階級政策；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因此我不能對他同情。但祇此一點，不能決定我對普蔭凱雷的整個態度。我一定要再考慮到這個事實，即他是一個文化程度極高的人，愛國心很誠摯，而且廉潔正直，無可訾議的。假使我們談到史丹林，其他任何人，以及一般的人，都應該採取這樣的態度。

一切人都是依照着上帝的形象來創造的，（雖然這形象會變化，怎樣還不清楚），而且每個人都能皈依永恆的生命，在這些真理之前，一切階級的分化，一切政治的憎感，以及社會生活在人類靈魂上每天所堆積着的冗贅物，都成爲渺小與無用了。爲此，階級鬥爭這一問題在經濟，司法與技術上雖然是重要的，但它首先總是一個精神的與道德的問題，它牽涉到基督教對

於人及社會的新態度，并且還有關於使全人類在宗教上更生的問題。

(註一)貝蒂也夫君的心目中，這話彷彿首先是對於東正教而言的，因為他是東正教友。不過他的這一鑑賞，在不同的程度中，又可應用於一切有歷史的基督教會之

權威者——英譯者。

(註二)見工團主義者愛特摩倍脫的有趣作品：國家戰爭與階級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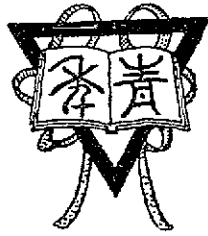


本書局已出版青年叢書目錄

第一種	甘地自傳 (譯本)	吳耀宗編譯	實價七角
第二種	海倫凱勒自傳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三種	中國青年職業問題	何清隱著	實價四角
第四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三集	何子恒編	實價一元
第五種	宗教經驗談	徐寶謙編	實價四角
第六種	性的教育	潘光旦譯	實價七角
第七種	科學偉人的故事	張仕章譯	實價二元二角
第八種	一個偉大的運動	許德麟著	實價二角五分
第九種	實驗宗教學教程	曾寶潔編譯	實價二角五分
第十種	社會福音	吳耀宗著	實價七角
第十一種	時代轉變中的上帝觀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十二種	今日之蘇俄	沈秋實譯	實價九角
第十三種	性的道德	潘光旦譯	實價六角
第十四種	蘇俄公民訓練	鄭彥彥編譯	實價七角
第十五種	我所體驗的基督	王揆生譯	實價七角
第十六種	社會主義新史	沈嗣莊編著	實價八角

第十種	改造中的蘇俄	楊丹森編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九種	變荒創業記	沈嗣非著 實價六角
第十種	反利潤制度	陳澤譯 實價一元
第十種	穆德傳	張仕章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十一種	宗教與人格	陳文瀾編著 實價七角
第十二種	耶穌傳	趙崇安著 實價七角
第十三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何子恒編著 實價一元
第十四種	個人道德與社會改造	楊續譯 實價六角
第十五種	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	楊續譯 實價六角
第十六種	科學的宗教觀	吳繼宗譯 實價四角
第十七種	當代科學家的宇宙觀	張仕章譯 實價六角
第十八種	近代科學與宗教思想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十九種	農村工作經驗談	余復謙編 實價四角
第二十種	世界名人小傳	于學儉編譯 實價五角五分
第二十一種	心理與生活	華丁爽譯 實價五角
第二十二種	創造的人生	何照東編譯 實價四角
第二十三種	第二次大戰與中國	牟乃器譯 實價三角
第二十四種	思想的探險	艾迪博士著 實價七角五分
第二十五種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張仕章譯 實價四角五分
第二十六種	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	應遠濤譯 實價四角五分
第二十七種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吳繼宗譯 實價九角
第二十八種	薩瑪里克自述	何子恒譯 實價六角
第二十九種	世界偉人的宗教信仰	姚贊慈譯 實價六角
第三十種	基督教與階級鬥爭	王一鳴譯 實價四角

乙



所 版
 種 十 四 第 書 叢 年 青
 爭 鬪 級 階 與 教 督 基
 有 權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郵費另加)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翻譯者
 王 一 鳴

原著者
 貝 蒂 也 夫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YOUTH LIBRARY NO. 40
 CHRISTIANITY AND CLASS WAR
 By
 Nicholas Berdyaev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Sept., 1936

